一年出版3期,以多种语言刊出

与 Dasten Julián 谈社会学

Johanna Sittel Walid Ibrahim

全球不平等 与疫情 Karin Fischer Kajal Bhardwaj Camila Gianella Christina Laskaridis Luckystar Miyandazi E. Venkat Ramnayya Viha Emandi

国家的 新角色? Julie Froud Andreas Novy Richard Bärnthaler Bob Jessop Klaus Dörre Walid Ibrahim Daniel Mullis

理论观点

Arthur Bueno

当社会学遇上艺术

Jenni Tischer

COVID-19: 疫情与危机 Margaret Abraham Karina Batthyány Esteban Torres Mahmoud Dhaouadi Alejandro Pelfini

议题开讲

- > 公民政治学领域的社会学家
- > 千里达及托巴哥沈默的亲密伴侣暴力
- > 论关照世界的能力
- > 人类作为文化人
- > 2011 年 7 月 22 日的挪威恐怖袭击

NAGAZINE





第11捲 /第2期 / 2021.08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主编的话

期刊物的「社会学对话」,讨论了智利当前的发展。在这场由 Johanna Sittel 和 Walid Ibrahim 主持的访谈里,从事历史/社会学领域研究的着名研究员 Dasten Julián,谈及了智利的政治发展、社会抗争和不稳定的工作现况,以及这些现象与社会科学及社会之间的关系。

过去一年半,COVID-19大流行使得日常生活从根本上改变,导致了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自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对话》致力于深入了解全球发展情况。在本期刊物中,Karin Fischer 组织了一系列讨论,针对印度、秘鲁、英国、南非为疫情和全球不平等问题带来的贡献,进行系统性反思。虽然全世界的人口皆受疫情影响,但「我们并不是都坐在同一条船上」。疫苗的发展、市场化和缺乏可及性,以及疫情在健康、教育方面的影响,凸显并强化了贫穷/富裕国家、全球南方/全球北方之间,以及遭受生态或经济危机的弱势群体,和那些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群体之间的全球不平等现象。

本期刊物的第二个主题,将讨论经济与国家间关系的剧烈改变。提倡基础经济概念的学者们批评了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自由化,指出主流思想的侷限,并呼吁在医疗、教育、食品、公共交通等领域提供新的模式,并与民主机构塑造和控制的基础设施相结合。作者们也试图讨论,疫情当前不断变动的国家角色,将对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带来什么影响、可能导致社会走向独裁还是民主?社会学又如何受到新的国家干预主义挑战?

在理论观点中,Arthur Bueno 重构了过去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时代,这个时代导致了经济、社会危机以及主体性的危机。借由关注忧郁症,Bueno 讨论了从自我创业到耗竭、从自我实现到异化的转向,并谈及抗争运动和专制政治带来的影响,以及未来的前景。

艺术家 Jenni Tischer 则在文章中,解释了她的两幅拼贴划如何让隐形的劳动被看见,为有关疫情中必要劳动的论辩提供了一个观点。

COVID-19主题中的一系列文章,则概述了社会学的一些挑战。其中,Margaret Abraham 分析疫情如何伴随着与日俱增的家庭暴力;Karina Batthyány 和 Esteban Torres 讨论了社会不平等的议题;Mahmoud Dhaouadi 指出仇恨言论日益增长造成的影响;Alejandro Pelfini则关注社会的学习过程。

最后,「议题开讲」提供了理论思考,特别是关于相互竞争的人类概念,以及对不同国家关于暴力和 关怀的最近事件和当代发展的讨论。■

>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全球对话》主编

- >全球对话以多种语言刊出,请至ISA website。
- >投稿来信寄给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GLOBAL DIALOGUE



>编辑团队

主编: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编: Johanna Grubner, Walid Ibrahim.

副主编:Aparna Sundar.

执行主编: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顾问: Michael Burawoy.

媒体顾问: Juan Lejárraga.

编辑顾问: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 Nazanin Shahrokni.

各国编辑:

阿拉伯世界: (突尼西亚) Mounir Saidani, Fatima Radhouani, Habib Haj Salem; (阿尔及利亚) Souraya Mouloudji Garroudji; (摩洛哥) Abdelhadi Al Halhouli, Saida Zine; (黎巴嫩) Sari Hanafi.

阿根廷: 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 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Abdur Rashid, Ashis Kumer Banik, A.B.M. Najmus Sakib, Bijoy Krishna Banik, Eashrat Jahan Eyemoon, Ekramul Kabir Rana, Helal Uddin, Juwel Rana, M. Omar Faruque, Masudur Rahman, Md. Shahin Aktar, Mohammad Jasim Uddin, Mohammed Jahirul Islam, Ruma Parvin, Sabina Sharmin, Saleh Al Mamun, Sarker Sohel Rana, Sebak Kumar Saha, Shahidul Islam, Shamsul Arefin, Sharmin Akter Shapla, Syka Parvin, Yasmin Sultana.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gelo Martins Junior, Andreza Galli,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Gustavo Dias,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法国/西班牙: Lola Busuttil.

印度: Rashmi Jain, Nidhi Bansal, Manish Yadav, Sandeep Meel.

印尼: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Diana Teresa Pakasi, Nurul Aini, Geger Riyanto, Aditya Pradana Setiadi.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Abbas Shahrab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哈萨克: Aigul Zabirov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Madiyar Aldiyarov.

波兰: Justyna Kościńska, Jonathan Scovil, Sara Herczyńska, Weronika Peek, Aleksandra Wagner, Aleksandra Biernacka, Jakub Barszczewski,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Gabler, Iwona Bojad**ż**ijewa.

罗马尼亚: 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Iulian Gabor, Monica Georgescu, Ioana Ianuş, Bianca Mihăilă.

俄罗斯: Elena Zdravomyslova, Anastasia Daur.

臺灣: 李宛儒, 呂道詠, 洪柏勝, 陳昱嘉, 廖宇雯, 洪崇仁, 郭智豪, 黃翊碩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在这场和 Dasten Julián 的访谈中,我们讨论了智利进来的大型社会运动、建立新宪法的后续过程,以及面对普遍存在的不稳定性,参与的社会学家可以在这里发挥什么作用。



COVID-19大流行病暴露并加剧了现有的财富和收入、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在国家边界内,但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急剧。疫苗的开发、市场化和(缺乏)可用性,以及大流行病在健康或教育方面的影响,显示并加剧了贫穷和富裕国家、全球南部和全球北部、已经遭受生态或经济危机的弱势群体和那些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群体之间的全球不平等现象。



本次研讨会讨论了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与会者讨论了国家对这一流 行病的反应如何影响未来的治理形式,以及如何理解已经可以观察到的国家 干预主义的形式。是否有一种新的国家干预主义形式正在形成,如果有的话, 它将具有威权或民主的特征?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赞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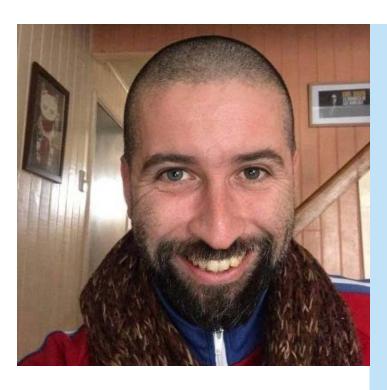
> 目錄

主編的话	2	> 理论观点	
		忧郁之后:后新自由主义方案	
>社会学对话		Arthur Bueno [,] 德国	30
危机之下的社会学:			
Dasten Julián 专访		> 当社会学遇上艺术	
Johanna Sittel 和 Walid Ibrahim [,] 德国	5	隐形劳动的视觉再现	
		Jenni Tischer,奥地利	33
>全球不平等与疫情			
COVID-19 和全球不平等		> COVID-19: 疫情与危机	
Karin Fischer,奥地利	9	疫情中的家庭暴力	
人命优先于利润:新冠疫情的号角响起		Margaret Abraham [,] 美国	35
Kajal Bhardwaj,印度	10	 COVID-19 危机下的新社会学与女性主义	
COVID-19疫苗:揭示全球的不平等现象		Karina Batthyány,烏拉圭、Esteban Torres,阿根廷	37
Camila Gianella,秘鲁	12	COVID-19 骇人的全球影响	
持续扩大的债务人与债权人分野		Mahmoud Dhaouadi,突尼西亚	39
Christina Laskaridis,英国	14	—————————————————————————————————————	
非洲在减少贫穷与不平等上的挑战		Alejandro Pelfini,阿根廷	41
Luckystar Miyandazi,南非	16		
印度的双重灾难——一项未完成的议程			
E. Venkat Ramnayya 和 Viha Emandi [,] 印度	18	> 议题开讲	
		公民政治学领域的社会学家	
> 国家的新角色?		Fredy Aldo Macedo Huamán,墨西哥	43
基础经济作为社会改革关键		千里达及托巴哥沈默的亲密伴侣暴力	1.
Julie Froud,英国	20		
适合未来的经济与国家制度		Amanda Chin Pang, 千里达及托巴哥 论关照世界的能力	45
Andreas Novy 和 Richard Bärnthaler,奥地利	22		
COVID-19: 国家与经济的新接合		Francesco Laruffa ¹ 瑞士	47
Bob Jessop,英国	24	人类作为文化人	
利维坦回来了!疫情国家与社会学		Mahmoud Dhaouadi,突尼西亚	49
Klaus Dörre 和 Walid Ibrahim,德国	26	2011 年 7 月 22 日的挪威恐怖袭击	
COVID-19:德国不安全地区的形成		Pål Halvorsen [,] 挪威	51
Daniel Mullis [,] 德国	28		

『在许多情况下,经济的增长是通过人类的痛苦和环境的 灾难来实现的。』

Francesco Laruffa

> 危机之下的社会学: Dasten Julián 专访



2019年在智利的社会抗争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知道,这些抗争活动是由上涨的公共交通票价所引发;是这一点稻草压垮了骆驼,还是说,从公共服务的状况以及其引发的冲突,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状态?

这起社会抗争起源于 Augusto Pinochet (1973-1990)的军民独裁政权所强制创立的宪法,系统性地消灭民主力量,并在1980年实现了欺骗性的公民投票。在拉丁美洲,智利是唯一保留军事独裁时期宪法的国家;其持续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并以各种形式发挥作用,以残酷而彻底的方式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打下基础。五十年来,在此种肆无忌惮、前所未有的商品化进程下,智利社会一直处于极度不稳定和被掠夺的状态中。

这样的状态,与1990年以来掌握智利政权的两个势力之间所拥有的政治共识脱不了关系。这

Dasten Julián.

Dasten Julián 博士是智利南方大学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位学者/研究员。他目前正在一项由智利国家研究发展学会资助的计划中担任主要研究员:《智利南部广域的工作不稳定:毛莱、纽布莱、比奥比奥和阿劳坎尼亚地区的交织、领土与抵抗》(2020-2023)。他也是南非金山大学社会、工作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助理。Dasten Julián 毕业于德国耶拿的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其研究主题包括:工作和生活的不稳定化、工会策略和组织、剥削主义、公共社会学,以及全球南方的相关研究。他的研究皆是在与民间社会、工会和非政府组织的紧密合作下进行。

在这篇文章里,Julián博士接受了 Johanna Sittel 和 Walid Ibrahim 的 访谈,他们皆为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工业 与经济社会学系的研究助理。

些势力透过两个面向来维持新自由主义秩序的首要地位:其一是信任市场作为福利分配和社会融合的实体;其二是以皮诺契特宪法,阻碍政治制度的民主化。1990至2019年被称为「民主转型」时期,意指为了回复特定的共存基础,以及社会中民主组织的存在,而进行的逐步民主化过程。然而,当经济模式出现高成长率时,制度与体制内的政治行动者却阻断大众参与政治与决策的管道。

政治系统和公民的距离越来越遥远,对政治系统的不信任与去合法化的整体进程,也正逐渐酝酿。经济关系的勾结、不正常的竞选金流案件、法院对商人有罪不罚等现象,皆是社会仍无法脱离独裁时期权力巩固网路的症状。「智利觉醒」的口号反映着人们在此时刻中良知、认同与权力上的揭露与反叛,正如政府的「战争宣言」、侵犯人权(在法院的正式投诉有8827件)、监禁示威者(多达27432人)等行为,呈现出形式政治中盛行的专制、保守和军事内涵。

智利的抗争结合了深具差异的主体性和地域性;年轻人、女性、长者、原住民、移民等等,在自主、合作下发展出结盟的抗争剧码。在私人与公共场域的政治记忆,于世代之间的相遇之下,过去与现在结合,政治在美学、艺术创意、音乐、街道、乡村地区、集会、对话与佔领虚拟空间等面向中展现出来。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曾经深入地在文化、政治与象征上重新相遇,并与「尊严」做为一个目标、习俗交织在一起。因此,此一相遇揭示的,即是智利社会的原始、构成要素,以及其社会契约、基础与宪法。

你如何看待目前宪法的建立进程?有什么样的 行动者为此站出来?社会科学在这之中是否扮 演重要角色,还是这个过程是由法律专家所主 导?

2020年4月26日,也就是一年前,智利举行了全国公投,有700多万人参加。超过78%的选民(约580万人)同意制定新宪法的必要性,并同意新宪法的制定应由当选大会(制宪会议)成员者执行,而国会议员不应该参与。由于投票的自愿性质,约50%的登记选民参与投票,创造了历史性的参与率。

如今,宪法制定的进程正处于关键时刻,因为制宪大会成员的选举将于4月11日举行1。制宪大会的组成涉及一系列有关性别平等和原住民参与的讨论,这不是选举的问题,而是政府干预和政治游说的问题,我们应随时对国会的决策过程保持警惕。这种集体的警惕,显示决策的过程是被体制绑架的,并为制宪时刻赋予了一层新的政治意涵:政党制度的振兴。

虽然反抗行动有反党的性质、注重群众行动,并保有对政治制度的批判,但最终引导、塑造制宪

进程的仍是国家机关。从候选人在登记、资金和 媒体方面遭遇的障碍可以发现,与作为政党成员 的候选人相比,独立的政治势力及其候选人,不 得不面对许多不平等与困境。这阻碍了独立组织 的发展,更不用说其中有许多政治势力早已四分 五裂。

疫情的肆虐使得讨论、拟订提案的辩论和会议空间受到限制。社会科学发起了一系列的反思,以批判与反身性的角度思考此过程,并以对侵犯人权的谴责与集体觉察为目标,从学术惯习中起身、承担公共角色,迎向当下的挑战。然而,相关行动大多仍局限于虚拟领域或书籍、科学文章等传统媒体;这使其影响与规模显着降低。即便如此,社会科学还是让公众对参与、科学与知识间的关系有了更多认识。

在你的社会科学相关工作中,哪些部分在智利近来的政治议题中扮演着特别的角色?有没有什么特定的领域或问题,是与社会科学和政治工作的结合特别有连结的?

我的研究关注的是劳动与生活的不稳定性。我致力于解释智利社会中劳动和生活的特点,并考量到镶嵌于权力交织点之中的文化、个人、经济和领土等因素。我的目标是和社会、环境与工会组织建立一个地方性的工作平台,改变其与全球研究网路的连结,并加强国家社会科学界在劳动研究方面的凝聚力。

由于我一直在调查社会不稳定的过程和劳动世界,我已经能直接地看到工作、就业和失业是如何被认为是人们生活条件的关键因素。就业品质、薪水、自动化、收入、平台的引入以及社会权利体系的薄弱,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负债、寻找非正式工作或寻找一份以上的工作,都是尊严和生活不稳定议题的一部分。其中,许多的问题贯穿了智利的政治和社会争端,也显示了年轻人、妇女、移民、老人等族群的不稳定状况。

当情况迫在眉睫时,社会科学是否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或是你认为科学将如何在不同的时局中发挥功能,尤其是长远来说?

许多人、许多团队一直致力于加强社会科学和社会之间的桥梁,目的是让人们看到,并强调科学

知识在决策、行动和民主审议中的重要性。学术研究与公共领域之间——尤其是与社会运动之间的这种隔阂是需要被克服的。事实上许多运动,如女性主义、环境和其他运动作为案例,已经让我们对这样的接合有了一些概念。

对社会科学来说,其责任在危机时刻更加被凸显出来。冲突经常是危机的症状,同时也是变革的预兆。此过程往往是社会科学的参考点。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社会学实践是对于当前迫切情况的一种回应。社会上发生的战争、掠夺和不稳定,使我不得不在一个非常现实的意义上采取行动,这是不稳定、脆弱和不确定时间性之可能性的一部分。由于阻碍了未来的想法(可能伴随着乌托邦的缺乏),其不仅有矛盾与消极性,同时却也传递着一种新的、更实际的、积极的,在知识中锻造乌托邦的方式。

你的研究结果是否在公众以及科学以外被理解, 政治行动者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发现又是否感 兴趣?

我的經驗顯示情況確實如此。但我認為,問題不我的经验显示情况确实如此。但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是研究结果是否能被看到,而在于是否确实有建立管道与网路,让知识能在其中被交换、对话、分享和再创造,使得与组织、协会、工会之间的持续沟通得以存在。我们尝试以在这些对话空间产出的诊断为基础、透过在现实中界定的问题来调整研究议程。我们致力于发展一个和谐共存的取径来回应全球科学的挑战与本地的公共问题。

这也是「南方工作研究小组」(GETSUR)诞生的原因。GETSUR 是一个地区性工作平台,依靠着全球研究网路,试图强化社会和贸易工会组织的架构。我们提倡与工会组织需求的协同和共生,为此,我们让大学在基础设施和后勤,以及知识和研究能力的面向上,皆能为特定问题的培力、资讯和/或反思提供协助。

十月起义确实是对社会科学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作为科学家,我们正见证自己的觉醒,以及参加并成为其中行动者的可能性,也让人感到振奋和新鲜。我相信,不稳定性和不稳定的概念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之一,使我们能够沿着这条路径前行。

你的研究主题是关于不稳定性、劳动市场的不安定,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社会的再生产。然而,你也参与在让 Temuco 的居民与政府机构合作进行回收的计划中。你能够和我们简单说明这个研究经验,并指出此种社会学研究的问题与挑战吗?

当然。这些经验是我随着一路走来发现的各种线索而出现的,在好奇心、教育与敏锐度的引导下,这些线索促使我与在地的其他行动者合作。在回收经验中,我与智利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合作,名为RADA;与这个NGO合作的还有与许多社会运动组织,例如 La Araucanía 与 Wallmapu 地区的领土组织、马普切(Mapuche)社群等。他们为 Temuco 城市的废弃物管理和处理拟定了一项策略和「零垃圾」方案,并为此在2017年向一个环境保护的公共基金成功提案。

2016年12月,该市自1992年以来一直运行的垃圾掩埋场关闭后,我们才开始了这个案例。垃圾掩埋场已坍塌,并污染了当地地下水。掩埋场设置在该市西部的22个马普切社区中间,对周围居民健康造成的后果在几次调查中皆得到证实,政府也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上进行投资,作为牺牲环境后、面对谴责的缓解手段。污染影响了当地的经济、生活条件和环境;但是,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下,许多人在垃圾掩埋场中,找到了透过回收和销售废弃物来维持经济生活的可能性。

这即是我们在2016年对非正式的回收者,即垃圾掩埋场的十荒人进行登记的原因。在掩埋场关闭前,我和RADA合作成立了回收者工会;该工会有62名成员,有些是来自该部门的马普切人,有些是来自特木科贫困地区的人。其中的大多数人,把这看作是一份家庭工作。在这项任务中,我有一个社会学学生陪同,他对掩埋场关闭过程和回收做为经济替代品之产生进行了研究。正是在这项研究中,面对工会提出的寻求和设计生存经济空间的建议,我们想到能以生态方式进行环境保护的提案。

在你看来[,]稳定性和地方环境倡议这两个研究 领域之间有何关系?

我认为两者的关系,可以从我前面和你说的经

验体现出来。在前述的经验中,我们开始在相互 关系的第一个节点上进行讨论:回收人员在日常 工作中的不稳定性,以及生活在回收部门的马普 切人的不稳定性、还有他们需要在垃圾场忍受的 环境种族主义。这两种类型的不稳定性,是与我 们理解发展、社会、工作、自然和生活的方式相互 交织的。它们共同存在于这样的冲突中——垃圾 掩埋场的设置、运作、关闭。

垃圾,作为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的产物,以及其生态不永续的物质性,向我们展示了不稳定性如何于此而扩展开来。靠垃圾生活的工人;人们准备在垃圾中吃饭或寻找食物;极端贫困和社会忽视。这就是为什么在垃圾掩埋场关闭之前,在回收方面普遍存在的非正式劳动形塑了一个新的社会驱逐区域,身处其中,将更难拟定坚持与生存的策略。工会的形成并不是政治力量的保证,因为制度的框架将暴露工人组织的脆弱性,同时

也让我们思考如何阐述一个有效的替代方案。

一系列的危机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因此,重点不再是风险的增加,而是生活的不稳定性的增加。我相信,当前的政治冲突引入了一种政治感知,特别是女性主义、环境的和非殖民主义的知识运动,邀请我们重新思考,如何面对贪婪的、掠夺的和战争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紧迫、危机感和承诺。

來信寄至:

Dasten Julián <dasten@gmail.com>

1.选举已因疫情关系延期,并将于2021年3月15日举行。

> **COVID-19与** 全球不平等

Karin Fischer,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奧地利

「在许多情况下,经济的增长是通过人类的痛苦和环境的灾难来实现的。」

冠病毒的感染是无差别攻击,也不分国籍的。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人类发展指数(一项综合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准的指数)正历经自1990年来的首次下滑。这样的下滑情形将会席捲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不管是富裕的或贫穷的)。

这样的情形绝不是要呈现出一种「病毒是平等的」幻象。COVID-19疫情显示我们并非在同条船上。如同联合国秘书长António Guterres指出的:「虽然我们在同一面海上,但有些人在豪华游艇上,其他人则是紧攀着漂浮的残骸」。这场疫情揭露了在国家疆界内既存且持续恶化的种族、财富收入和性别的不平等,而在全球尺度的不平等更是严重。

疫情带来的高度不平等现象从一般家户、地方层级政府到国家层面等不同尺度中观察到。这则专栏文章将会聚焦在以更大视角来分析不平等,例如全球南方和北方的不平等。富国和穷国间深植的不平等反映在三大主题:一是疫苗、科技和治疗资源上的不平等、二是国债和财政不平等,最后是气候变迁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一篇是Kajal Bhardwaj 的文章,阐述与贸易有关的智慧财产权协定(TRIPS)更加重视智慧财产权与私人利益,而非「健康人权」。企业垄断的权力激起一股看似是疫苗帝国主义或有疫苗和无疫苗国家状态的隔离,造成抢疫苗和不公平分配疫苗的情景。Camila Gianella在他的文章中分析全球疫苗采购战中遭受不平等的祕鲁。尽管祕鲁疫疫情中感染和死亡率在拉美是很高的,但辉瑞药厂在秘鲁拒绝疫苗采购协议中的部份条款后,将祕鲁排在疫苗供货的最末名单。

疫情和由此而来的全球衰退正使各国陷 入债务陷阱。这不只是穷国才会面临的问题。 根据全球主权债务监管在2021年的调查,148 个全球南方的国家中就有132个面临严重债 务。Christina Laskaridis 指出在疫情中主权债 务的不平等。他明确指出和债务有关的政策是 强国间力量的角力问题,也关乎人们的生存境 况。Luckystar Miyandazi 针对全球获利分布不 均补充说明:非法资金是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榨取,最终流入个人、贸易合作夥伴、跨国公司和 全球北方避税天堂的口袋。 她写道,非洲每年损 失的资金几乎与官方发展投资和外国投资的年 度总和一样多。这意味着这些国家没有财政空间 来发展经济、或为应对 COVID-19 的特殊社会保 护计划提供资金。 以尚比亚为例,偿债义务和非 法资金外流将进一步扼杀尚比亚的经济并阻碍 其长期发展。

此外'E. Venkat Ramnayya 和 Viha Emandi 则关注印度部分地区中'疫情和生态脆弱性呈指数增长的现象。 他们指出'疫情下的社会和经济冲击因缺水、洪水或飓风等生态灾害而进一步恶化。同样'环境灾害的后果呈现不平等分布,且主要影响那些已经因疫情而受苦的人。

COVID-19 是一项全球性的挑战。然而,当问题越接近、挑战越大,视野似乎也就越显得被侷限在国族主义,甚至是其他的狭隘观点中。上述学者宣扬了这样的观点:在每个人都安全前,没有人是安全的!

來信寄至:

Karin Fischer < <u>Karin.fischer@jku.at</u>>

>人命优先于利润: 新冠疫情的号角 响起

Kajal Bhardwaj,律师,印度新德里



2021年,於伦敦威斯敏斯特的英国製药业协会办公室,「 立即实现全球正义」和「人民疫苗计划」为全球疫苗平等 而开展活动。

來源: Flickr: Jess Hurd/Global Justice Now

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 (WTO) 面临全球受到 HIV 疫情时,遭受多边协议里智慧财产权 (IP)和TRIPS 协议应的影养。当时,跨国制药公司指控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允许进口价格合理的治疗HIV阳性非原厂药。当这些持有药物专利的公司需取数万美元,非原厂的 HIV 药物每天只花费1 美元。这些公司声称南非的行为违反了 TRIPS 协议。因应全球对这些制药公司的愤怒,WTO 通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公共卫生的Doha宣言》,这亦确认了各国有权以支持保护公共卫生和所有人皆有权获得药物的名义来解释TRIPS协议。

>新冠疫情和TRIPS障碍

二十年后在新冠疫情下,有三分之二的WTO 成员要求免除TRIPS 协议下的知识产权义务。Doha宣言强调的TRIPS 灵活性——强制许可、平行进口或严格的专利标准——帮助各国获得负担得起的抗爱滋药物、C型肝炎、癌症和心脏病治疗。但印度和南非目前的提案认为,像COVID-19 这样的快速传播、快速变异的传染病需要完全免除知识产权的障碍,让国家和竞争对手可以自由地进行任何COVID-19 药物或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生产——无需在复杂的谈判中浪费时间、无需担心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也无需担心来自富裕国家的贸易压力。

正如预期的那样,富裕国家认为知识产权并 没有制造障碍。但在新冠疫情爆发的一周年之 际,证据恰恰相反。 尽管全球的注意力都集中在 对 COVID-19 疫苗的不平等分配和抢夺上,但这种不平等从一开始就出现在取得口罩、诊断、设备和治疗上。

对于更广泛的公众来说,对于智慧财产权保护的认识可能来自于新闻,一位从事呼吸器阀门3D 打印的义大利研究人员可能面临智慧财产权拥有者的法律诉讼。一位美国参议员要求 3M这家拥有数百项口罩设计专利的公司放弃其专利以增加口罩供应。法律诉讼的威胁迫使罗氏药厂公布其在荷兰进行 COVID-19 试验的药物配方。Cepheid 所生产的45分钟 COVID-19 筛检的价格明明可以由19.80美元降低至5美元出售,引起了公民团体的谴责。美国跨国公司MNC Gilead以 2,340美元的价格出售抗病毒药物韦德西韦并以320美元为授权费用为少数发展中国家提供服务。利物浦大学的研究人员估计,韦德西韦大规模生产的价格可能低于6美元。

当富裕国家平均每秒为一个人接种疫苗时, 大多数最贫穷的国家甚至都还未接种过任何一 剂。 全球南方有相当大的疫苗生产能力,但包括 专利、商业秘密和资料独占权在内的知识产权阻 碍了其发展。 欧洲专利局的数据显示,有数百项 与新冠病毒疫苗相关的专利。 研究表明,疫苗专 利往往非常广泛,涵盖成分、技术、施用年龄组和 剂量。商业秘密保护使疫苗生产商能够掌握快速 扩大生产规模的专有技术。

> 全球南北方治疗的差异日趋扩大

根據牛津大學對其 COVID-19 技術的非獨根据牛津大学对其 COVID-19 技术的非独佔知识产权的最初承诺,牛津-AZ 疫苗本应可用于大规模生产。然而,牛津大学 AstraZeneca 公司达成独家协议之外,AstraZeneca 又再与一些制造商签定秘密许可条款。 AZ疫苗的生产能力明显不足,因为印度生产的疫苗逐渐流入一些开发中国家。 当初非营利定价的承诺并未兑现,据报导,较贫穷的国家每剂AZ疫苗支付 3 美元至8美元。

法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富裕国家率先采取法律措施促进 COVID-19 的强制授权。以色列对抗病毒药物 Lopinavir/Ritonavir 颁发了强制许可。匈牙利和俄罗斯对 Remdesivir 颁发了强制许可。政府消除知识产权壁垒的行动通常

导致公司改变其利用知识产权牟取暴利的行为。 以色列对 AbbVie 公司发布的强制许可,导致 Lopinavir/Ritonavir 的专利将不再被 AbbVie 公司垄断。印度、泰国和阿根廷的病患组织团体 已就 Remdesivir 和 Favipiravir 提出解除专利 的要求。一家加拿大制造商已公开寻求娇生疫苗 的许可,并可能寻求强制许可。

富裕国家已投入了数百万美元的公共资金 来开发COVID-19的疫苗、测试和治疗方法。然 而,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并面临供应中断。他 们没有消除知识产权的法律壁垒、开放知识共享 和增加产量,而是抢购疫苗并实施出口限制。更 糟糕的是,那些国家没有要求公司对其生产能 力、价格或协议保持绣明。据报导,一些谈判甚 至触及要求各国对疫苗的不良反应进行赔偿或 以大使馆等政府资产作为抵押。这些公司拒绝 参与世卫组织的技术共享平台或不愿意优先提 供给Covax 实施计划以协助疫苗的公平分配, 药厂组 织也正在加强对政府和联合国机构的游 说力度以规避知识产权壁垒。世卫组织和联合国 机构已公开支持 TRIPS 的专利豁免。但世贸组 织秘书处正埋头苦干,坚定地继续推动自愿专利 豁免。正当这些立场似乎越来越坚定,但在基进 主义者为 TRIPS 豁免进行了数月的活动后,美 国贸易代表于 2021 年 5 月 5 日意外宣布支持 TRIPS 豁免,尽管仅限于 COVID-19 疫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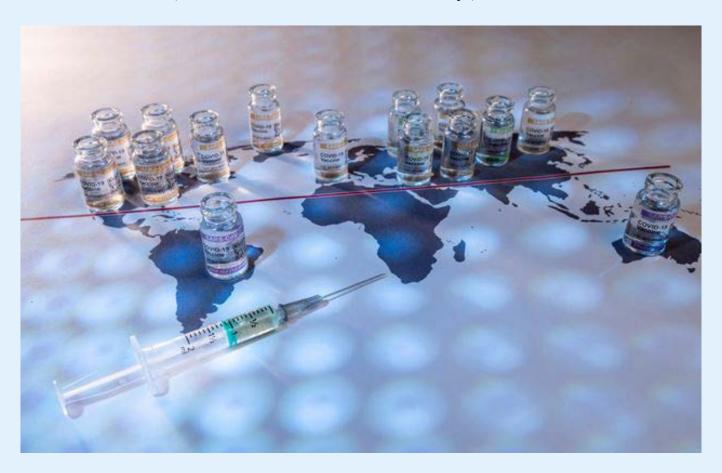
显而易见的是,即使美国的举动将推进TRIPS 豁免的谈判,我们仍浪费了过去一年的时间,等待药厂做出正确的行动事。应该为普遍大众提供疫苗的呼声越来越高。随着新的COVID-19变种病毒出现,国家面临一波又一波的毁灭性浪潮、死亡与难以消灭的疾病,带给患者、家庭和卫生系统莫大损失——我们没有本钱把时间浪费在置利润于人民之上的复杂贸易规则中。TRIPS 的专利豁免将是清除阻碍所必须的第一步,以确保每个人、在任何地方都能接触到所有COVID-19的医疗技术。■

來信寄至:

Kajal Bhardwaj <<u>k0b0@yahoo.com</u>>

> COVID-19 疫苗: 揭示全球的不平 等现象

Camila Gianell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Cisepa, 秘鲁



疫苗分配与大流行之前的全球不平等现象遵循同样的不平等模式。

來源: FrankyDeMeyer/Getty Images/iStockphoto。

OVID-19正在对全球的经济和社会产生 毁灭性的影响。而在这场全球危机中发 出的警示告诉我们,不管身在何处的我 们都将面临着同样的危机,也就是说我们在同 一条船上。这就好比在挪威的卑尔根、秘鲁的利 马所面临的封城。此外,还得应付像是在利马富 裕社区封城时,必须相应封锁居住在同一城市 棚户区家庭住宅等重大挑战。

尽管有人<u>呼吁</u>必须要能够保证各国都能平等地获得疫苗,但这种同质化(homogenizing)的想像仍导致了COVID-19疫苗的分布不均。真

正的实际情况是富裕国家赢得了这场比赛:它们是首批有能力购买疫苗并开始为国内人口接种疫苗的国家。虽然<u>挪威</u>等一些富裕国家已承诺会与较贫困的国家分享疫苗,但到了 2021 年 1 月,疫苗的获取量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财力。

> 私有化的药物开发体系

这些我们所看见世界各地难以取得疫苗的情况,并不只是一些吝啬的特定国家所造成的,在这其中也反映了一个有问题的全球药物开发体系。事实是,许多富裕国家已拨出公共资金来开发疫苗。即使辉瑞(Pfizer)公司否认有公共资金参与其疫苗的开发,但根据报告显示,其共同开发疫苗的合作夥伴公司也有获得公共资金。富裕国家参与疫苗的开发可以使他们能够要求「更好的疫苗价格」,但我们并不否认私营公司他们从疫苗中获利的权利。因此,尽管当前急需为南非的人口接种疫苗,以阻止新型变种病毒传播下去;但根据目前的行情,南非不得不支付几乎是大多数欧洲国家2.5倍的价格去取得牛津阿斯利康(AstraZeneca)的COVID-19疫苗。

公共资金的挹注并没有限制私人疫苗制造商对保密条款、调整法律上的要求。这些行为保护了制造商,他们仍可以借此在 COVID-19 疫苗产生意外的副作用时自保。在各国急需疫苗的当前,加上缺乏能够对 COVID-19 疫苗贸易施加基本条件的全球领导力,使疫苗制造商获得了庞大的权力。在这之下,疫苗制造商总是不断地拖延或拒绝与那些需要疫苗的国家进行谈判,使这些国家难以在第一时间获得疫苗,最终导致了大量的死亡,还让新型变种病毒出现及扩散。

一个谈判失败的例子是秘鲁与辉瑞公司。秘鲁同时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及全球 COVID-19 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21年1月,当该国才正要开始面临第二波疫情之时,卫生系统就已经崩溃。早在2020年,秘鲁政府就已开始与辉瑞公司谈判,但他们拒绝接受该公司所强加的部分非责任条款。因此,尽管COVID-19 在秘鲁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但辉瑞还是将秘鲁排在了出货名单的最后面。这与南非及疫苗价格的情况一样,他们的做法完全不受惩罚;在全球如此紧急的现况之下,那些能够强加条款规则,并决定谁可以用什么价格获得疫苗的,正是疫苗制造商。

> 取得疫苗、获得健康人权

像疫苗这类必需药品的取得,是实现每个人身心健康权利的基本要素之一。开发药物和取得开发成果是获得药物的关键要素。因此,管理取得药物开发的法律和规定是国家卫生政策的核心要素。COVID-19的疫情正揭示着我们所缺乏的全球领导力,以及各国难以规范贵重商品制造商的痛处;同时也告诉我们当前医疗开发计划的局限性。在向私营公司分配公共资金这点上,显然不足以保证药品的取得会普及化。■

來信寄至:

Camila Gianella <gianella.c@pucp.edu.pe>

> 持续扩大的债务人与债权人分野

Christina Laskaridis, The Open University,英国



| Arbu 繪。

富裕国家透过债务融资和经济刺激对抗经济衰退时,全球南方的中低所得国家正陷入了一场债务陷阱。伴随着长久以来的国际贷款只促进了债权人的利益而非债务减免,殖民主义的遗毒、以及全球南方因过去主权债务所形塑的地缘政治,都正因COVID-19疫情而有所强化。

> 北方与南方的不平等和全球债务融资

David Graeber 即是其中一个揭露债务如何有效地掩盖历史性的依赖与不平等之权力关系的研究者。他指出,在债务的语言中一次又一次重塑的强权关系使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显得更加有问题。国际贷款作为殖民计划的一环,使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因偿还困难而积累冲突,并导致了特定的境外监督机制和军队的介入,然而债务人成功地中止还款并抵抗收债的情况并不少见。近来,新殖民主义与金融化的棱镜,反射出了国际债务下的全球不平等现象。对于次级金融化趋势的从属特点是不平等的债务关系,发展的结构性限制则是来自相较于核心的从属地位。

与此有关的其中一个面向是和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有关。正如凯因斯以及后凯因斯学派所假设,当国际经济体系正处在充满不确定和不稳定的情况,流动性偏好将会最为明显地反映在金融资产的阶序中。有关债务陷阱不断积累的警告一直到疫情前夕都在持续地增加。美国为因应全球北方危机而实施多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加上金融业的行动,创造了全球流动性的高峰,却也对当前的债务危机产生了连锁反应。这导致了开发中国家在全球的资本竞逐,并使得许多低所得和中低所得国家的债权人样貌产生变化,融资机会和成本变得高度不平等。当国家的融资和再融资能力高度依赖其无法控制的因素时,将构筑面对「市场风险」的结构脆弱性,并增加了对商品依赖所引起的外汇波动问题。

债务偿还问题是由发展上的限制以及全球生产结构所引起的,它们本身就是殖民历史的产物,而不是经常听闻的有关国内公共财政管理不善此一解释。另一方面则是有关如何解决债务危机的问题上根深蒂固的制度失灵。当债务偿还问题出现时,各国面临着债权人论坛、异质的法律环境、被资本市场排除在外、以及债

权人诉讼的风险,甚至被迫放弃发展计划。这往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紧缩计划同时出现,这些计划不能为债务问题提供公平和长期的解决方案,削弱了一个国家保护弱势人民的能力。众所周知,债务危机的处理方式的特点是「太少、太晚」,经常无法重建债务的永续性,而债务国也往往需要付出极大的社会代价。

> COVID-19对债务的影响

随着疫情的爆发,既存的全球经济不平等现象也被凸显出来且不断加剧。伴随着贸易中断,也就是各国所仰赖的外汇来源,除了造成由金融市场所决定的主要商品价格下跌之外,2020年春季时资本流动的逆转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这导致了各国货币的贬值,使偿还外汇债务的负担变得更加严重。在危机期间难以取得的强势货币,反映了国际经济里的不平等整合与从属位置,并形塑了不平等的应对能力。这明显可见于不同的所得群体所获得的财政援助规模的差异,有权力的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也强化了回应流动性需求的不对称性。

只有某些最强势的国家可以利用美国联邦 储备银行启动的计划,扩大美元交换的范围, 而区域性的融资规划则大多不活跃,使得全球 债务问题的主要政策应对来自G20和国际货币 基金(IMF)。然而,尽管无条件、无负债的债务 融资需要约2.5兆美金,加上约1兆美元跨所得 群体的债务豁免,以及早该全面进行的债务结 构改革。针对全球债务问题的应对措施,往往依 赖于向已经面临偿还债务问题的国家提供跨区 域、跨所得群体的高额贷款。其中一些国家已经 将大量的公共税收用于偿还债务,甚至比花在 健康照护上高出好几倍。G20在2020年4月制 定了债务暂缓偿还倡议(DSSI),IMF的贷款和 对于双边债务偿还的暂时推迟,使现有的债务 问题恶化,预计将导致未来多年的撙节,同时间 接地使不参与的私人和多边债权人得到偿还。 债务暂缓偿还倡议的自愿性意味着债务减免是 部分性的,对不参与的债权人是有利的,但代价 是昂贵的且远大于所需的。2020年11月的The Common Framework,即反映了这些已知的 制度失灵。

> 倾斜的国际债务结构

疫情凸显了现有的国际债务结构长久以来 的失能,包括管理债权人群体、预防集体行为产 生的问题、保证债权人间的平等,而最重要的是 确保迅速、透明、独立和全面地处理债务偿还困 难的问题,并最小化债务危机对国家人民的影 响。必须回顾一下,现有的方法一直试图依照债 权人的利益来管理债务危机所造成的结果,不 断拒绝中低所得国家提出的方案。这个系统的 一个核心要素是世界银行和 IMF 的财政紧缩 计划,这些计划经常对人权产生负面影响,并依 赖于将债务定位为「永续的」的贷款审核过程, 不仅加剧了债务负担,也低估了问题的规模,并 破坏了所需的救济。一直以来,随着某些高所得 国家持续经济刺激的警铃大响,对全球债务问 题的应对预设了成长将回到疫情前的水准,各 国将在过渡性的赤字支出后拥抱财政紧缩政策 的大流行,放弃投资与所需的社会支出,以缩减 政府开支。

我们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的条件和财政紧缩政策恶化了成长前景,对健康、不平等和贫困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以及偿还债务方面的不良记录。虽然这再现了资金不足、弱化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但也强化了这些机构正当性不足的问题。结果再次表明,制度过程强化了国际经济整合的历史因素。贷款审核过程正是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权力不平等的征兆,它突显了由谁决定什么可以支付和什么不能支付的知识政治。使得债权人能够优先考虑重整债务所需的成本,而非未能重整债务以缓解债务人的处境。

來信寄至: Christina Laskaridis <christina.laskaridis@open.ac.uk>

> 非洲在减少贫穷与不平等上的挑战

Luckystar Miyandazi, 计画专员、无国界税务稽查员及非洲区协调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Africa Financial Sector Hub, 南非

2020年3月新冠疫情袭击全球之前的几十年,就已经有许多指标指出全球不平等的升温。基于国籍、年龄、性别、种族、民族或族裔、宗教、经济、地位和其他面向的差异,COVID-19疫情和其前所未见、对生活各面向的影响,正如我们所见,只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多重面向的不平等。

> 贫穷和不平等的倒退

仅管COVID-19的盛行率与死亡率在非洲仍然很低,但非洲大陆仍面临着挑战,要从因疫情而恶化的债务和金融危机中复甦。这也侵蚀了非洲先前针对17项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SDGs)中的所做的努力,例如改善医疗保健、食物取得和教育。更重要的是,这也破坏了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在2015年对永续发展目标的肯认,即要消除贫困就要减少不平等。在洲的层次,《2063年议程》(Agenda 2063)是非洲大陆促进永续和包容的经济成长与发展的长程转型愿景,非洲的展望也是将终结贫穷和不平等列为首要项目。因此,不平等与发展和经济成长高度相连,亦成为全球主要的政策议题。

不幸的是,联合国的一份报告预测,2020 年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极端贫穷的情况将出现大规 模的增长,将有2600万人因为疫情而落入国际 贫穷线以下的生活状态。此数字是该地区2015 年时的贫困水准,意味着其丧失了过去五年的进 展。因此,对于非洲来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重要的是,透过在各方面创建一个永续、正义 和公平的社会,来改善那些最贫困和最边缘化的 人的生活。 对许多非洲国家而言,经济不平等一在社会的不同群体间,收入和机会的不平等分配—是最被关注的。即使是国内生产毛额 (GDP) 最高的非洲国家,如奈及利亚、南非、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安哥拉,也有部分的贫穷或不平等处于最严重程度的纪录。

非洲国家在减少不平等和投资于发展上,面临两个另外的挑战:非法资金流动 (IFF) 和不断加剧的债务危机。

> 非法资金流动

IFFs 指透过某些商业行为非法赚取、移转或使用的资金,如借由非法空壳公司藏匿公司真正的拥有者;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如偷猎、毒品、武器和人口贩运、石油和矿产盗窃;以及促成这些资金外流的重要因素,贪腐。富有的跨国企业、避税天堂和个人应该为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中多数的非法资金流动负责。某些部门的IFFs集中度较高,特别是采掘业和采矿业,最后往往集中到富裕发达国家或非洲的贸易夥伴。回顾过去二十年,卢安达解密(Luanda Leaks)、毛里求斯解密(Mauritius Leaks)、卢森堡洩密(Lux Leaks)、瑞士解密(Swiss Leaks)、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天堂文件(Paradise Papers)等税收相关的丑闻层出不穷,揭露出IFFs的问题,并引发大众和政治上对相关处置的关注。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 的 资讯,非洲因 IFFs 而造成的损失约为 886 亿美元,相当于其一年 GDP 的 3.7%。这些流出几乎

「非法资金流动不是一种「无害的犯罪」——它们对个人和社 会都是有害的。」

与每年非洲国家获得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总和一样多。这显示了,如果非洲能拿回因 IFFs而损失的资金并投入非洲大陆的发展,即便没有外国援助,非洲也仍具有潜力。

在一个已经受苦于缺乏收入的大陆上,这些 钱仍正在流失。因此,IFFs并不是一个「没有受害 者的罪行」——这对个人与社会都有害。这对发 展也有明显的影响,因为这夺走了健康、教育、基 础建设和其他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资金,加剧非洲 和全球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程度。

> 恶化的债务

非洲還面臨到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機,由於向非洲还面临到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由于向外部的公共和私有债权人借款导致的债务问题日益严重。因为COVID-19,有些国家要求取消和减免债务,以协助他们从疫情对健康和经济的严重影响中复甦。

然而,举例而言,位于内陆并有丰富资源的尚比亚在2011年才达到较低的中等收入地位,不断上升的外债负担和最近的债务偿还违约,被一些公民归咎于政治精英管理不善、贪腐、缺乏透明度和糟糕的政策回应,这也助长了贫困和不平等。2020年,尚比亚成为第一个未能偿还4250万美元国际债券的非洲国家。尚比亚一直努力挣扎,维持其对其他国家的外债支付,如中国、多边机构和外部私人债权人,包括贷款与债券。除此之外,COVID-19压垮了医疗体系,也加

速人类与经济危机。采矿、农业和观光等重要的经济部门受疫情影响,导致工作流失和失业率增加。由于债务和提供给多国的多重税收优惠,能投资社会安全网的政策措施的财政空间也受到限制。

> 需要有利于贫穷的税务政策

国内资源动员(DRM),指透过课税和有利于贫穷的税收政策,达到在非洲社会和国际上降低经济不平等的重要措施。

课税对促进平等能有关键的影响力,例如:借由增加税收以提供更具需要性的公共物资与服务(如教育、公共医疗)。累进税率可用于收入和财富的重分配、极大化社会福利,并减少经济差距。课税也能作为一种有力的社会手段,调整人们在健康、性别平等和环境上的选择和行为。课税同时作为一种代表性和问责性的重要工具,透过较好的税收分配,资助对穷人有益的公共服务。

明显地,课税是达到发展目标的必要资源,并且在减少非洲与全球不平等上扮演重要角色。税收的角色不应以单一面向理解;它不仅是用于资助对疫情的回应与复甦,更是为了建立更加公正且平等的社会。■

來信寄至:

Luckystar Miyandazi <<u>AzreeStar@gmail.com</u>>

> 印度的双重灾难: 一项未完成的议程

E. Venkat Ramnayya and Viha Emandi, Youth For Action,印度



环境灾难的后果主要影响那些已经遭受大流行病影响的人。例如,印度海德拉巴的奥斯曼尼亚综合医院的冠状病毒患者在2020年由于大雨而被淹没。

來源:Twitter@UttamTPCC。

便疫情退去,生活也远远称不上 正常。遭遇疫情和洪水双重灾难 的印度也证明了人命、生计和财 产的损失会更惨。2020 年,在 COVID-19 期 间,印度几个邦面临大自然的愤怒,暴雨和飓 风,导致生计、农作物和人命的丧失。这对数 百万在 COVID-19 袭来后返回村庄但无法 维持生计的移民造成了更严重的影响。政府 和公民社会组织的救援行动并不足以应对如 此巨大的双重灾害。大自然的反扑让我们应 变不及。COVID-19 无疑是一场公共卫生灾 难,并唤起大众对加强公共卫生投资的关注。 但是,从根本上说,疫情本身反映了生态失 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生物多样性的流失 和人类侵入自然都加深了 COVID-19 疫情 的爆发和传播。了解生态学和评估环境变化 将是确定未来潜在疫情的关键。 COVID-19 也使得那些支撑起农业、健康和环境的生物 科学更加需要被关注。

>疫情封锁和移民社群面临的问题

在印度,弱势的移民社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 不得不面临多重的心理和经济压力。众所周知,大 多数的妇女从事非典型工作。由于封城,当反向移 民发生时,大量妇女从城市返回乡村后在村里找 不到任何工作。这导致了女性的抑郁、绝望和经济 不确定性。疫情封城的同时,据报导,家庭暴力投 诉增加了100%,而妇女无法从社会机构那里获得 任何社会援助。由于他们不熟悉智慧型手机以及 缺少政府支持,难以联系原生家庭,导致女性焦虑 和自杀增加。有大量的少女和年轻女性拨打1098, 一个儿童求助热线支持中心,旨在保护他们免受 身心虐待。健保机构无法解决除了COVID-19 以外 的问题,贫困妇女不得已只能靠自己,在治疗和生 产小孩上花费大量金钱。由于政府救济金和物资 不足,学校关闭也就意味着儿童无法获得学校午 餐,因此妇女和儿童的营养不良现象也十分普遍。 部分家庭承受显而易见的饥饿,缺乏就业导致他 们为生存而耗尽微薄储蓄。

>洪水

即使在像海得拉巴这样的城市地区,贫民窟和小型定居点的弱势人口也不得不在洪水湧入时放弃家园。这些贫困社区的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和家庭用品,不得不暂时搬到新的地方,承受着巨大的生理、心理和经济压力。洪水是政策规划错误的结果,在排水渠和储水区进行建设的后果就是进一步降低了城市环境的负载力。此外,从2014年起在印度发生的一系列飓风和洪水是印度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为排放,以及国家缺乏规划的发展活动所造成的结果例如,2014年8月比哈尔邦东部的Kosi河发生大洪水,这是由于河流发源地尼泊尔的暴雨以及那里释放每秒两千八百万立方公尺的水所造成的结果。Kosi河沿岸的洪水影响了大约225,000人,他们失去了生命、作物、牲畜和财产。

> 政府必须行动

现在是决策者认清气候变迁的现状,并共同努力恢复生态环境的时候了。我们希望美国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对此做出新的承诺。在 2020年 11 月举行的第十五届 G-20 峰会上,印度总理呼吁为后疫情世界制定一个新的全球指数,其中将强调在大地之母委讬管理的精神下尊重自然。峰会另一个目标是创建庞大的人才库,确保技术复盖社会的所有层面,并且更重要的是治理的透明。以 18 个国家和 4 个国际组织为成员的抗灾基础设施联盟 (Coalition for Disaster 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CDRI) 的成立将给予自然灾害期间的基础设施破坏至今尚未受到的重视。这对于受灾影响过大的贫国在拯救生命和生计上尤为重要。

制定全球政策可能需要时间,但印度的未来 应该是重新定义「贫穷线」的概念,并努力实现赋 权指数。赋权指数将包括满足八项基本需求:医 疗保健、卫生、住房、基本营养、洁净能源、教育、 安全饮用水和社会安全。企业部门必须支持政府 实现这些基本需求,而非急于赢得疫苗合约;应 致力于实现永续发展以产生高品质的成果,使获 得疫苗成为弱势群体的首要权利。企业必须采 用企业社会责任 (CSR) 基金来加强医疗基础设 施、疫苗的获取以及面对COVID-19 和气候变化 的行动。印度政府必须将其卫生预算从目前佔 GDP 的 1% 提高到至少 5%,以应对后疫情的 医疗挑战。用我们组织中自助团体的女性成员的 话来说,政府必须为她们提供一个安全的生活场 所、能更好地满足基本需求、并启动应急措施以 满足她们当前的基本必需品。■

來信寄至:

E. Venkat Ramnayya <<u>vedvon@yahoo.co.in</u>> Viha Emandi <<u>viha.emandi@gmail.com</u>>

> 基础经济作为社会改革的关键

Julie Froud,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英國, 為 Foundational Economy Collective 所寫



人们经常对所谓的「必须劳动者」表达感激,然而他们大多数人薪水却很低、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工作,并面临COVID-19 带来的劳动新风险。

來源:Flickr/创用CC。

今的疫情强烈地提醒人们基础经济的重要性—也就是那些每天不断被消耗、并使安全和文明生活成为可 能的商品及服务。其中包括管线、电缆网路等基 础设施,传递了公用事业、通信、交通运输和食 品供应,以及及时的(providential)¹服务如保 健、照护、教育和收入支持等2。人们倾向视这些 为理所当然,低估了服务本身和提供服务的工 人的价值,直到严重的中断造成生活不便或重 大威胁。在 COVID-19 期间,许多公民意识到 食品分配系统的岌岌可危,就像断电和干旱提 醒了我们对持续供电和供水的依赖一样。疫情 带给我们「关键工人(kev workers)」或「重要 工人(essential workers)」一词,也就是那些 在危机期间继续「上班」以确保日常基础设施得 到维护的人。同时很明显地,这些重要工人中许 多薪水极低、处境艰难危险,并面临COVID-19 带来的全新职业风险。

除了及时提点基础经济的关键性质之外,这场危机还强调了集体组织、供应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消费的重要性。即便是高所得者,仍然得依赖交通系统的品质或医院的加护病房;个人的高收入并不能确保良好的 Wi-Fi 讯号,也不能保证干净的空气品质或优良的公园。同理,我们的个人安全取决于疫情期间,全球医疗服务的品质和范围。所有这些都放大了经济进步衡量标准(例如人均 GDP)的限制,其未能掌控构成美好生活的不同价值,且经常没有充分凸显重要工作的意义。

> 供应和基础设施的革新

为了认知到这些物质和及时服务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对当前提供的机会进行清晰、彻

底的思考。简言之,眼前所呈现的是一个双重挑战,我们要透过政策和政治关注,同时保护现今、未来两个世代的福祉。许多国家甚至在COVID-19来袭之前就已经暴露了基础服务供应的不足,原因来自于投资不足、私有化、市场化和金融化的共同集合。崩溃中的基础设施、处在高龄化社会却欠缺资金的照护工作、「食物沙漠」,也就是都市公民无法轻易获得优质且新鲜的食品:这些都是基础设施供应失败的例子,在这些方面着手改善将提高公民的福祉。

大多数情况下,为当前世代的福祉打从基 础进行改革,需要借助额外的财务来源,包含资 本和收益。即便是在德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交 通和教育端的基础设施恶化同样引起了激烈讨 论。然而,光凭投资本身无法解决组织并提供服 务时所遭遇到的问题,这代表改革还需要兼顾 重组经常功能失调的商业模式。举例来说,缺乏 资金的照护体系需要更多资源,以满足人数逐 渐成长的老年、弱势群体,其健康和社会需求。 然而,如果照护的供给者来自私募股权或其他 榨取式经营的所有权,那额外的资源就可能被 导向更高的利润,而非用于僱用更多的员工或 改善照护品质。或者,将照护交由大型官僚机构 组织,同时接受照护者的投入很少,则额外资源 应结合改革,以实现在地化提供,并赋予利害关 系人更多发言权。大多数情况下,为当前世代的 福祉打从基础进行改革,需要借助额外的财务 来源,包含资本和收益。即便是在德国这样的高 收入国家,交通和教育端的基础设施恶化同样 引起了激烈讨论。然而,光凭投资本身无法解决 组织并提供服务时所遭遇到的问题,这代表改 革还需要兼顾重组经常功能失调的商业模式。 举例来说,缺乏资金的照护体系需要更多资源, 以满足人数逐渐成长的老年、弱势群体,其健康 和社会需求。然而,如果照护的供给者来自私募 股权或其他榨取式经营的所有权,那额外的资 源就可能被导向更高的利润,而非用于僱用更 多的员工或改善照护品质。或者,将照护交由大 型官僚机构组织,同时接受照护者的投入很少, 则额外资源应结合改革,以实现在地化提供,并 赋予利害关系人更多发言权。

在重建基础设施和服务以改善公民服务的同时,基础改革所面临的政治挑战还包含应付气候和自然危机,以便留下福祉给未来世代³。例如,要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就需要来自住房、交通、食品等基础经济活动的重大贡献⁴。有

鑑于这些活动是不可或缺的,减少排放不会来自于节制使用,而是来自新的法规和行为转变所催生而成的生产、消费变化。这可能包括不同的建筑技术、改造现有建筑以节省能源、改变所消费的食物成分,并以人力旅行和大众运输工具替代私人交通工具。

> 国家的明确角色

国家在这些改革过程中扮演着明确的角色。不仅许多基础服务在某种程度上皆由国家提供和/或资助,而且通过获得这些日常生活基础设施而实现的社会公民身份,也需要一个负责、反应迅速的国家。许多原本的基础设施,如供水和污水系统、电网或公立医院,都是通过从上而下的规划和工程所实现的。改革和提供新的基础设施也需要提供更强力的角色给公民参与,特别是在需要权衡、取舍的情况下(如应对气候变迁或预算考量),或者当社区和在地组织的专业知识已经了解如何改善社会成果的情况,如公共保健方面。

基础经济的改革也是推动其他政策如全民基本收入或普及基本服务的重要前提。简单地向公民提供现金并不能确保福祉,因为生活品质取决于能否取得集体提供的服务,例如医疗保健、宽频、社会住宅、融合且可负担的大众运输,以及绿色空间。如果说疫情有留下什么具有意义的遗产,它应该包括基础经济的改革,以社会和生态永续的方式,提高现今的宜居性。

來信寄至:

Julie Froud <julie.froud@manchester.ac.uk>

- 1. 此处使用「及时的」一词意指未雨绸缪、超前部属(provident),以提供未来的需求。这个词呼应了天赐社会(providential societies),其建立是为了让人们能为未来的疾病等费用预先储蓄。本术语涵盖公共和福利服务。
- 2. 更多资讯请参见: https://foundationaleconomy.com/introduction/
- 3. 更多资讯请参见: https://foundationaleconomy.com.files.wordpress.com/2021/01/fe-wp8-meeting-social-needs-on-adamaged-planet.pdf
- 4. 斯德哥尔摩研究所(Stockholm Institute)估计威尔斯59% 生态足迹可归因于食物 (28%)、住房 (20%) 和交通(11%)的消费: https://gov.wales/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2019-04/ecological-and-carbon-footprint-of-wales-report.pdf

> 适合未来的经济和国家制度

Andreas Novy 和 Richard Bärnthaler, 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奥地利

有人都知道,我们目前生在剧烈动盪的时代。问题不再是二十一世纪「是否」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而是这种转变将会「如何」发生—如同我们目前面对疫情所经历的一样,以混乱的方式发生,或是集体塑造而成。后者取决于两个先决条件:重新思考经济学,以及加强公共和民主机构。

>二十世纪经济思想的侷限

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在19世纪佔据主导 地位的市场自由主义观点,经历了一次复兴。经 常被批评为新自由主义的它,早已渗透到政治 思想中,影响远远超出了右翼政策制定的范围。 市场在提高(生态)效率、完善稀有资源配置方 面的优势,已经成为一种教条,约束着欧盟和美 国的主流观点。然而,更完善的市场并不足以 使我们保持在地球的界限之内-不仅因为绿色 成长(在经济成长与环境压力没有绝对脱钩的 情况下,实际上根本不是绿色的)倾向借由增加 消费量来抵消所获得的效率,还因为市场自由 主义忽略了佔优势却无法延续的惯例、做法和 习惯。它秉持着近乎宗教似的信仰,相信资讯透 明、理性的消费者有能力透过个人市场选择「解 决」气候危机。这种市场优先的解决方案不仅加 剧了消费机会不均衡,还对民主构成了威胁。在 市场自由主义中,国家既不软弱也不侷限于自 由放任,而是具备强大的授权来强制执行合约 和保护私有财产权。然而,在这个产权集中于财 团企业内部的世界中,市场自由主义国家产生 了新的、不民主、高度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跨国 公司已成为全球规则制定者和决策者,能够将 成本外部化到社会和环境上,并将这种外部化 转变为私有的股东价值。

二战以后,无论是在世界北方,还是世界南方的发展型国家,都出现了立基于福利资本主义的「战后共识(post-war consensus)」。基础

设施供应被视为公家当局的一项基本任务:从 获得健康和教育,到能源、住房、流动性供应的 显着市政化或国有化。更大范围的工具-对宏观 经济的干预、对市场范围限制和再分配措施一造 成了多元化的经济制度,促进了西欧和北美的 繁荣以及全球南方的国家发展。虽然在 20 世纪 末,这种经济共识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端遭遇 到严重挫折,它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重新获 得影响力。21 世纪版本的福利资本主义反映了 社会-生态系统转型的务实途径,促进生态现代 化,并认可国家在创新和产业政策中扮演更积 极的角色,但忽略了利润和增长的急迫性,以及 消费主义如何构成我们生产和生活的方式。结 果,不平等依然严重,气候灾难也升级。更惊人 的是,由领土所组织而成的「福利和管制型国家 (welfare and regulatory state)」,其效力已 经被日益去领土化的经济削弱,使跨国公司能 够逃避国家立法并集中财富。

>一个新兴框架

有鑑于不断升温的危机,第三种经济思想开始浮现。它吸收了马克思、凯因斯、布劳岱尔、女性主义经济学和基础经济集体(Foundational Economy Collective)的见解,以区别:(1)日常活动的基础经济领域,包括生存和在地供应,以及免费的照护工作;(2)可创造价值的市场经济,包含非必要的本地供应和出口导向的活动;(3)价值接收的食利人经济(rentier economy)。Karl Polanyi的观点,将经济理解为一种组织生计的系统,最适合用来应对社会一生态系统转型的挑战,强调扩大和强化基础经济(第一优先)和非必要的地方供应(第二要务)、转变出口导向的市场经济、缩小食利人经济。

当我们认知到地球上所有人的美好生活只能透过后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模式的转型来实

「加强适合未来的经济的有效战略,需要通过有选择的经济 去全球化,为各种纠缠在一起但适当的政策空间赋权,并追 求相关的领土化自决形式。」

现时,这种途径却缺乏以民主手段引入必要改变的策略。一些支持者倾向抗拒国家和权贵的草根运动和公民社会行动主义,从而强化了市场自由主义中的反国家主义和政治宿命论,并将过去几十年的主流后政治决策与国家机构混为一谈。然而,一连串威权政府的崛起,展示了国家机构的潜在力量。尽管它们当中,无论是在当代的巴西、印度还是中国,都不是适当的模型,但它们纷纷展现了国家与生俱来的潜力,也就是作为具有领土化主权的边界管辖实体:例如内政「国家」(municipal-state)、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欧洲「国家」(Europeanstate)。忽视国家有可能对合法的规则制定进行垄断,不只天真和危险,尤其是牺牲了对抗霸权的潜在筹码,并依然深陷于利基游戏之中。

> 非资本主义国家机构的必要性

一个强化经济、使它更适合未来的有效策略,需要透过选择性的经济去全球化,赋权给多种相互纠缠但适当的政策空间,从而追求相互关联的领土化形式自决,例如城市、区域、国家等。国家透过公共和民主机构管理一片领土,既不能限缩为「民族」国家,也不能沦为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创新的国家形式需要更加地分散,赋权并保护中间的媒介机构和自我管理的、非商品化的工作和生活范围。然而,批判性政治经济学强调这种进步的国家机构在资本主义下的侷限,坚持认为在资本主义之下,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同意,一个公共和民主的国家机构只能在资本主义以外的经济体系中蓬勃发展。然而,由于非资本主义领域一直存在于资本主义「之中」,非资本主义国家机构也可以存在于资本

主义之中:例如合作社、市政公司和公共退休金体系。由于资本主义依赖基础经济领域(尤其是照护和基础设施),非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实则维系了资本主义的正当性和效力。因为资本主义依赖它自身的否定,国家机构可以强化基础经济区域,使所有居民都能享有文明的生活。可以将负担得起的集体供应系统(照护、健康、教育、住宅、流动性)进行结合,并排除无法永续的选项(如:禁止短途飞行)和将投资转向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如:通过补贴、直接投资、税收、社会许可经营、再培训计划)以确保社会生态系统的普遍性。短期而言,这是可以走出新自由主义、加强资本主义内绿色、非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可行策略。

然而长远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地球上所有人的美好生活仍然不兼容。因此,为了走出资本主义,新的国家形式必须围绕着去商品化的生活领域,「超越」它们原先资本再生产的功能,繁荣地发展。这可能造成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转型,基础设施供应的投资和营运将变得更加社会化,并降低对劳动市场所得的依赖。促进福祉将制造更多的空閒时间,而非提高薪资,获得公共物品将比拥有私人物品更受重视,降低生活成本(例如:负担得起的公共基础设施和住宅)将优先干提高购买力。

來信寄至:

Andreas Novy < <u>Andreas.novy@wu.ac.at</u>> Richard Bärnthaler < <u>richard.baernthaler@wu.ac.</u>

<u>at</u>>

> COVID-19: 国家和 经济的新接合

Bob Jessop, Lancaster University,英国

OVID-19疫情的严重性仍持续者。若未 能消除病毒,在疫情被控制之前,我们不 会知道什么是最有效的回应方式。然后 很明显地,有些国家在控制病例和减少额外死亡 上更为成功。同样明显地,疫情为国家介入互助 行动和支持私人企业上提供了新的理由。本文将 探讨疫情的这个面向。

此次疫情可被视为全球危机。危机往往会扰乱公认的世界观以及如何在其中「继续」运作,从而质疑理论、政策典范和日常惯例。尽管疫情长期被视为潜在威胁,COVID-19危机在最开始也是很大程度被建构为外来的、威胁人类的意外冲击。这反映在保护人类安全的生命政治论述,以及针对内在威胁(如:移工、吉普赛人)的激进论述。另一方面,疫情危机也可以被追源到农业资本化侵袭大自然,并创造了病毒自动物传染给人类的条件。COVID-19的扩散也反应全球贸易和国际移动的兴盛,让病毒更容易在国家间、大洲间移动。尽管如此,疫情发生率不是均匀分布的:不同政治体制对其有不同的理解、有些着重生命政治的安全、防御内部敌人的问题、或者是经济议题比健康议题更重要。

> 对英国应对失当的解释

本文聚焦於歐洲和北美,這些地區抗疫上的 本文聚焦于欧洲和北美,这些地区抗疫上的 表现不佳可能来自于一种策略,使政体更直接、 更持续的臣服于「全球化的必要性」这种新自由 主义论述。这种策略将社会的「脆弱性」视为一种 规范的工具,加强了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并伴随 着财富不平等和恶化阶级分化。这也加速了体制 的转变,从共享公民权的福利国家到强制的工作 福利体制,特别是美国一如果不服从规范有被监 禁的可能性。新自由主义赋予市场特权并借以国 家力量扩张。相反的,COVID-19使国家成为关键的行动者,包括公司协力、无条件的团结(互助行动)和复甦互助的社会。

英国是个新自由主义政治体制,其组织碎裂、去中心化,且缺乏整体公、私部门的协调,使该国对疫情缺乏准备。政府也分心于执行脱欧的需求,且有一个只顾民调民调首相。也就是说,英国公卫系统对疫情的准备不足。从2009年到2018年,健保相关预算的人均支出下降1.2%,与健保需求的增长并不相符。人力短缺包括护理师4万多人、普通科医生2,500人、住院医师9,000人,加护病房的设备也不充足。

过去的政府准备的疫情因应策略是一张技术官僚的蓝图,它并未思考到健康和社会照护基础建设恶劣的情况,包括呼吸器、个人防护设备,以及工人与边缘族群的脆弱性。回顾2011年的流感因应计划(Influenza Pandemic Preparedness Strategy),英国政府的政策「依循科学」,就和紧急情况科学建议小组所提的相同。科学家错误地将本次疫情跟流感类比,并预估疫情将造成25万的额外死亡,且透过分类来处理病患(允许老年人死亡、将病人分散到照护机构)。当民意拒绝这种策略,政府尝试稳定感染数以延缓病毒的扩散,随后将中央权力下放和建立封城的层级,而这通常为时已晚。确实,低病假工资意味者经济不稳定者即便身体不适也会选择继续工作。这导致了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

英国政府未能有效地建立「筛检-追踪-隔离」的系统,且因为对私部门运作的一味信任,他们没有将地方服务和国家机构连成一致的因应措施。除了从特定国家返国的旅客,没有针对隔离或检疫者进行系统性地追踪。英国的社区筛检是在NHS(英国国民健保署)的架构外运作的,

「这场大流行为国家干预提供了新的理由,以互助和支持私营企业为导向。」

并没有像德国、爱尔兰、南韩等其他国家有良好的医疗监督。然而借由公卫服务,疫苗接种政策则是被妥善地处理。

英国在应对 COVID-19 时将财富置于健康之上,结果适得其反。事实上,保卫健康也能更有效的保护经济。在美国、英国、瑞典和巴西,政府最初拒绝重视COVID-19的致命性并保护生命。让(大)企业持续运作更为重要。这造成延迟封城和社会隔离措施,随后「轻度」封城并无法抑制病毒;接着,太早解封也导致疫情再起。

> 国家强势行动的成功

虽然 COVID-19 是全球疫情,但与科学家相比,政治人物之间几乎没有一致的应对措施。相反,疫情和疫苗国族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且几乎没有在协调全球疫苗接种上投注努

力与金钱。这在全球北方尤为明显,他们清楚疫情会影响全球南方。然而,不论是民主国家或威权国家、岛国或大陆国家、儒教国家或佛教国家、社群主义或个人主义,东亚、东南亚和澳洲国家比起欧洲、美洲国家在COVID-19的控管上做得更好。以强力的国家行动和公共卫生措施推动,纽西兰、新加坡、越南、台湾和澳洲采取的「清零」政策奏效,比起容忍死亡、逐步增强免疫力、广泛疫苗施打政策的群体免疫政策更为有效。我们可以预期,后COVID-19的探询将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因应方式,并建议适当、良好的投资于公共卫生和照护基础建设,并大力支持有效的国家行动。

來信寄至:

Bob Jessop < b.jessop@lancaster.ac.uk >

> 利维坦回来了! 疫情国家与社会学

Klaus Dörre 和 Walid Ibrahim, 德国耶拿大学



德国埃尔富特的疫苗中心。这是「疫情国家」的照护面向,还是必要的经济复甦措施? 來源:Walid Ibrahim。

们可以如此总结现下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下的世界情势:「利维坦」 ▲回来了!在 Thomas Hobbes 的开 创性着作《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 质、形式、权力》中,他选择了海怪的比喻来表 达现代国家的矛盾本质。在现下的新自由主义 时期,这头海怪看起来正在退缩,但事实绝非如 此,因为即使在智利,也只有一个专制国家才使 得「芝加哥男孩」的市场激进实验成为可能。然 而,社会学式的社会批判首先意味着市场的批 判。在此背景下, Karl Polanyi 能够成为一种双 重运动——这种运动一上来就等同於对市场的 深远脱离——的学术见证人,绝非巧合。自从新 冠肺炎疫情突发以来,钟摆已经往回摆动:利维 坦干预着——作为对抗疫情的紧急状态国家,同 时作为一个在诸国家和地区投资了无数资金以 保护并在必要时重建经济的干预主义国家。

> 对「新冠国家」的评估

该如何评估这样一个国家?系统理论家恼怒 了,因为他们本来已经剔除国家行动者对所有社 会子系统的有效干预的可能性;凯恩斯主义则因 为国家债务现已成为刺激经济的一种可选择的 手段而感到喜悦;再者,自由派记者却为那在「新 冠国家」无数次的封锁和闭关中被加以悬置的「 基本权利 | 感到担忧。那麽,我们该如何评估这一 干预主义国家?作为初步的答案,我们大胆地提 出如下论点:国家干预主义将成为「带着全新面 孔的资本主义」的助产士。无论如何,就「新冠国 家以两种从根底上不同变样而却又松软地连结 在一起的国家行动同时回应疫情和经济衰退来 说,它诚然是个混合物:新冠疫情正应付以紧急 状态,这种紧急状态一方面是在宪法框架内运作 的,而另一方面却由於暂时性地悬置了基本权利 而凌驾於宪法之上。国家「例外状态」的惟一正当

性在於对抗疫情,它执行具有约束力的的社交距 离以避免病毒的迅速传播,这种做法自然是在应 对医疗灾难,然而,随着疫情逐渐可控,这种做法 将失去其正当性。所有被特定分析者所欢迎的例 外状态倾向,包括减缓日常生活的步调、放弃消 费、避免旅游、花时间照顾自己和他人等等,被 认为在疫情结束以後只能以自愿的形式持续。恢 复前疫情自然状态的那种显而易见的冲动暗示 此类分析如何与现实脱节。

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评估这样的经济干预 主义国家。逐渐摆脱财政紧缩、平衡预算、「黑 零政策」(Schwarze Null),以及(迄今为止仅 暗示)对巨额资产及高收入的更高的税收,相较 於早期的市场激进主义更显进步。话虽如此,疫 情国家并不保证能够满足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的社会一生态转型。就政治一经济的层 次而言,它如履薄冰,因为即便是在富裕的国家, 高昂的公共债务也只有在中央银行和金融市场 彼此配合并保证低利率政策的情况下才能运作。 这只是导致情况愈发严重:我们看到那些负有债 责的国家机具大多以缺乏经济和产业政策的想 像力呈现自身。由於抛弃了谨慎的干预主义,对 於如何处理透过投资或重建计划所获得的意外 之财,它们所知甚少。

> 经济干预的界限

由於上述缘故,或许不该再对疫情国家的生态永续效果抱以过高期待。干预主义经济国家旨在直接地抵消经济活动的收缩。债务通融重建计划的正当性是以增长的效度来测量的。以这种观点来看,疫情国家乃是一种矛盾的存在。经济干预主义国家是要倒出其不平等的孪生兄弟——疫情紧急国家——为它煮的汤。在这个过程中,生态永续的目标自然要被搁置在一旁。

气候变迁在此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教训。新冠疫情只有乍看之下才是具有生态效益的。正如2007年的冲击,封锁和经济危机导致了「因灾难而退化」。没错,受限的流动和暂时性的工业崩溃是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几十年内未有过的程度。然而随着经济的复苏,排放量却攀升得比预期的还要快。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计算,

证实2020年前三个月的全球排放量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八,这相当於原来整个欧洲的排放量。但是自2020年四月以来,全球排放量在此攀升;到了十二月,全球排放量已经高於去年同期的水平。为了实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认为仍合理可控的1.5度全球暖化方案,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以平均每年7.6的百分率减少——但这只有持续地进行而不是在暂时性的封锁方有可能。国际能源署担心,2019年达到全球排放峰值的历史性机会正在被浪费。作为高债务水平和税收减少的结果,所有社会面临着的艰难的分配斗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

最後,必须注意到尽管干预主义国家是个利 维坦,但这个怪物却有可能带来有益的影响:它 保护自己的国民,置人类生命於经济利益之上。 当然,作为另一面,它使对疫情的对抗成为帝国 对抗的对象。惟有那些拥有足够疫苗并迅速地执 行疫苗接种的国家才具有快速的经济复苏机会。 作为结果,全球健康威胁势必与疫苗民族主义进 行斗争。尽管已经发出讨许多团结性的声援,截 至2021年春天为止,仅有十个国家获得了足足百 分之七十六的可用疫苗,而多达八十五个低收入 国家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开始对其人口进行 疫苗接种。由此将增加对疫苗具有抗性的突变的 风险。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支配的国家体系无 法将疫苗视为一种公益善举并协助实现人人享 有健康保护的永续目标(SDG 3)。因此,以其主 要的运作形式来看,疫情国家并非社会和环境永 续进步的保证。对社会学分析及其批判来说,上 述种种指向了重新界定社会学自己的主题的需 要:国家必须再次成为社会学专业知识的焦点。 为了如实地评估疫情国家究竟何谓及其如何运 作,我们需要大量的、全球性的、跨学科的研究 计划。如今正是国际社会学界快速且果断地触及 这些任务的时刻。■

來信寄至:

Klaus Dörre <<u>klaus.doerre@uni-jena.de</u>>
Walid Ibrahim <<u>walid.ibrahim@uni-jena.de</u>>

1.「黑零政策」指的是一种平衡的预算。

> COVID-19:德国不安 全地区的形成

Daniel Mullis,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 (PRIF), 德国



废弃生产大厅。 來源: Daniel Mullis。

Rosemary-Claire Collard 定义了生命政治的计算,他主张这是「精确的掌握谁或哪些生命受到监管或确保安全」。延续Michel Foucault,生命政治即关注人口福祉的政治学。也就是拥有「让人活者」和「让人死」的能力。Matthew Hannah、Jan Simon Hutta 和Christoph Schemann 认为,国家对 COVID-19的回应「从生命政治的角度来说是合理的,藉由『再生物化』人口,以及尽可能让最多人存活做为首要目标。但显然有些生命比其他生命更重要。在世界各地,COVID-19的感染程度随着阶级、种族和性别的边缘化而上升。疫情具有显着的地理性,揭示了社会中被忽视的部分,那些国家不愿意保护的地方。我将藉由德国政府选择介入/不介入的相关资料来阐明这个论点。

>外围化

「病毒集中的地方,也就是城市和社会外围的地方。」Samantha Biglieri、Lorenzo De Vidovich和Roger Keil 这样主张。早先在2021年1月的谈话中,Roger Keil 便已提出三种相关的外围化模式:空间外围化指不在当代社会中心位置的空间;制度性外围化来自国家主导的措施,以将人们推向边缘的方式组织社会;以及社会外围化涉及激进的社会分歧一我将藉由在种族中加入阶级与性别面向来扩展这个观点。

关於COVID-19在德国的地理分布,Robert Koch 研究院表示,在2020、2021年间的冬天,高社经剥夺区域的死亡率较低社经剥夺区域高出约50%至70%。根据柏林、布莱梅或科隆等都市地区的数据,疫情对人口密度高、平均收入较低、贫困率较高的地区带来较严重的冲击。当讨论国家介入/不介入时,制度性外围化是三种模式中最有意义的。举例来说,在贫困和空间外围化的形成中,这尤为明显。

关於第一个例子,贫穷问题在德国是个不争 的事实,在经历德国基於《议程2010》进行的福 利制度改革後,贫穷议题更为显着了。除此之外, 低工资部门实施,基本社会扶助也改组。贫穷并 不是自然存在的:这是不正义的经济体制生产/ 再生产的,并且有法律和国家权力的协助。後果 显而易见。数据显示,与社会中更富裕的阶层相 比,依赖基本社会扶助的人遭受 COVID-19 的 影响要大得多。长期失业者接受住院治疗的比率 几乎是在职者的两倍。缺乏经济资源的人生活在 更加拥挤或狭窄的环境中,经常是被边缘化而住 在社会住宅;他们在不稳定的处境下工作;他们 也缺乏数位基础建设,使得在家线上学习难以进 行。这些都加深他们的脆弱性和 社会分歧。在疫 情期间,不富裕的人失去了收入,中产阶级维持 他们的地位,而超级富有的人更加富有了。

讨论的第二个例子一空间外围性的生产一这是一个从社会中心位置发生的政治过程。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原则下的政治决策创造了核心和边垂。结果包括将他们排除在社会住宅、难民营、无家者收容所、疗养院,以及发配於不稳定的工作状态。在疫情期间,这些社会配置都成为德国的 COVID-19 热区。於此同时,为了将疫情与主流社会区隔,在政治话语中,特别是住宅区和都市区被描绘成危险的地方。这种策略往往出现在有关贫民区的讨论中。首先将疫情空间化,然後将部分空间标记为「移民」、「贫穷」、「不守规矩的」等,从而得出结论,该空间及其居民才是真正的问题。

> 中心性

显而易见的是,制造安全/不安全的空间是有权力者采用的政治过程。Foucault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化进程中,政治经济学成为政府决策的理据。Wendy Brown补充说:「国家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而国家的正当性与经济成长息息相关。」德国管控COVID-19的措施遵循了这个原则。根据现有数据,只有12.8%的附加价值毛额是受到与疫情相关的限制的直接影响:这些影响最主要在零售、餐饮、教育、旅游、休闲以及文化产业中。其他87.2%的经济继续运作着,影响并不显着。并没有任何措施是试图暂停经济活动以保护危殆劳工於染疫风险中。

那麽,外围空间的大规模爆发也呈现了中心性。这可以为屠宰场、物流中心和学校的高感染率提出理由。肉品工业是德国重要的出口导向部门,其生产不能停滞。在物流中心的案例中,一位来自波兰波兹南市的 Amazon 员工 Agnieszka Mróz 尖锐地指出,她说她和她的同事不是受害者,而是那些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工作,对商品物流通畅至关重要的人们。就学校的面向来看,很明显地,尽管有许多关於儿童权利的讨论,但儿童在疫情期间从来没有被重视。开放学校主要是为了让家长成为可用的劳动力,而不是为了教育的正义。

> 国家(不)干预主义的模式

COVID-19 标志出多重的空间、制度性和社会外围,这些是病毒和社会效果产生最多负面影响的地方。社会经济剥夺使人们面临致命的风险和贫穷。关於国家干预主义,重要的是要强调威权和安全导向的路径,也是大多数政府在对抗病毒所选择的,而不是将人民纳入基於团结和正义而限制自由的民主过程中。同时,也应更仔细地分析国家在哪些方面选择不采取行动和不让哪些地方安全。相反地,政治决策加深了分化、边缘化和外围化的模式,沿着阶级、种族和性别的面向,从那些被边缘化的人中区隔,以保护「人民」。

來信寄至:

Daniel Mullis < mullis@hsfk.de >

> 忧郁之後:後新自由主义方案

Arthur Bueno,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德国,以及 ISA概念与语句分析 (RC35) 研究委员会成员



二十一世纪的转向主要发生在忧郁症的标志下,主要表现为疲惫、空虚和无法行动的感觉。 來源: Ehimetalor Akhere Unuabona 於 Unsplash。

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变动的时代。从 2008年的经济大萧条到近年来兴起 的政治抗争、从新右派崛起到疫情 的冲击,一系列的徵兆预示着我们正身处历史 的交叉口:旧的世界正在死亡,而另一个世界尚 未诞生。这些过程带来的新挑战,不只建立了一 些社会制度,也影响了离我们最近的事物——使 我们数十年来习惯於感受、思考和行动的方式 进入耗竭。我们面临的危机是关於主体性的。 如果不考虑後者的结构与其目前的转变,我们 便无法适切地评估其带来的危险与潜力。但是 我们应该如何描述这个正处於危机当中的主体 呢?

> 主体的企业化忧郁

二十一世纪的转向,主要是以忧郁症为标志。当时的心理痛苦,似乎不再以弗洛伊德时期的经典精神官能症症状为主要表现,而是疲惫、空虚和无法行动的感觉。弗洛伊德的精神官能症是一种内疚的疾病,在这种疾病里,主体会感觉自己在那些被允许的和不被允许的事项之间,以

及法律权威和被压抑的驱动力之间挣扎。相较之下,忧郁症则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关於「不够好」的疾病;在此疾病中,虽然没有不被允许的事情,但是人们会感觉自己永远没有办法真正达成自己可能达成的事情。一个人之所以变得忧郁,是因其必须承受「一切皆可实现」的幻觉:被困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间,在无限的可及性,以及一个人真正能完成的事情之间,忧郁症患者只是「无力的人」。

从精神官能症到忧郁症的临床诊断转向,不仅与特定的受苦经验有关。其可以被视为一种1960年以来新社会秩序的徵兆:个体在越来越小的社会支持,以及越来越多的不平等、竞争与不稳定之下,被要求拥有更强的自我责任与自我实现。在後福特主义的积累制度以及个人真实的浪漫理想之间,「选择性亲和力」(elective affinity)促使一种新的主体成为人们主要的关注——新自由主义的「自我企业家」预设人们应透过回应「做自己」的期许来取得市场上的成功,或是像某本畅销自助书籍说的那样:「最好的你:做自己,只会更好」。这样的企业化主体要求的并

非纪律的服从,而是维持一种不寻常的生活——既追求在尝试中创造、发现自我,也追求情感交流,并能富有弹性地适应於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忧郁个体的存在,即呈现出这种成为自我企业家的要求,对主体来说是充满问题的:实现真实自我的要求造成空虚感与耗竭、追求进行自我决定的自主性则带来了异化的感受。忧郁不只是临床诊断的问题,也成为了各种主体性失败的关键字,且与二十世纪以来的规范性期待有密切的连结。

> 耗竭的危机与政治

即便这样的社会格局——我们将其喻为「忧郁的社会」——充斥着逐渐提升的张力,过去十年间,人们却有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其稳定。在二十一世纪之交,这样的制度安排似乎藉由明确的政治主张以及组织化的社会抗争,阻止了忧郁症状被表达出来。如今,这样的秩序承受的压力更加强大,以至於其存续受到严重的损害:忧郁的耗竭本身正面临耗竭。在此背景下,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对於「後忧郁集合」(post-depressive constellation)展开讨论。在个情境中,忧郁症秩序的社会—心理张力已经来到巅峰,导致了各种反应和抗争,却仍未建立一个新的共识和稳定的制度框架。

我将论证,上述说法的基础,在於过去几年 内更常见的政治抗争形式,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对 两种既有主要张力的应对:新自由主义,以及企 业化忧郁的个体性。

关於「自主性」的问题,这种对主体性的承诺,是一个人能够透过作为企业家的主动性达成自我决定:藉由在当今社会生活所组成的各种市场中,提供一种创新的产品,个体将能在这些市场上留下个人印记,并以自己的形象和方式进行改造。然而,在履行这样的承诺上反复失败,反而导致了一种强烈感受,即人们受制於一套预先确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往往是难以理解和修改:是「没有别条路可以走」的。因此,很自然地,这个时代的一些社会运动,表现出对统治精英的明显不满,并要求给予人民更多的参与权: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一种,对於社会监管这种普遍形式下宿命论的反应。

新自由主义的主体性的另一个张力,则是关於真实性的问题:在与社会承诺的人和人的情感共融,以及将社会生活作为原子化个人的市场竞争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正如柴契尔夫人所说:「并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每个人都应该是一个自给自足个体的这种要求,促使人们的孤立感和社会断裂感更加扩大。因此,许多这个时代里的政治运动,自然也表现出一种对於情感共融经验的渴望;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对社会「崩解」(disintegration)此种普遍形式的反应。

然而,要描述後忧郁的情境,并不能止於单一的政治行动或组织的凝聚方式。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新的秩序,而是一个新的集合,一组不同的反应和政治视野。在下文中,我将讨论过去几年中变得突出的两种政治立场,但他们不应被视为当前危机中的唯一立场。我们的现状是以一个尚未得到单一、普遍解答的核心问题为框架——在忧郁之後的是什麽?

> 後忧郁的欢腾

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从2013年6月的巴西到法国的「青年党」——许多2010年代兴起的政治运动,皆在其决定性的时刻中,以一种结构模糊的集体情感沈浸经验为特徵,并且缺乏明确的目标。对於理解它们为何可以被看成是後忧郁情境的表达来说,这两个特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社会运动在规范和情感上的模糊性经常遭受批评,却也是其吸引力的基础:其允许一种基於参与共同氛围的团结感、一种认为社会和政治差异不再是不可调和的,而是可以由多样性中建立起的情感统一。这对理解这些运动的主旨非常重要。与自我企业家的自给自足,还有忧郁症患者的孤立无援相比,许多人认为和众人在街头的共同经历,是一种情感上的解放或宣泄。

不言自明的是,这种(相当不明确的)情感团结,是立基於众人对抗着一个共同的(且同样不明确的)目标:即政治制度、普遍的机构、「在那里的一切」(all that is there)。集体的欢腾(effervescence)体验,由於对既定规范的激进挑战(即使是瞬间的)被集合在再一起,而得到了增强。与警察对峙,封锁街道、占领公共机构:突

然间,生活似乎不再受到一套不可改变的、致命的规则约束。相较於自我企业家是应於一套预设的规范,以及忧郁症患者的无力感,挑战既存秩序的经验,能让人感觉自己重新获得了有效的集体自决能力。

然而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时刻内部常常是不稳定的。人们很快地认识到,这种团结感是由难以调和的异质元素所组成;参与者也渐渐发现,他们的规范性立场可能会导致与现况极度不同的政治安排。正是因为这些运动的规范性模糊,以及情感的不确定性,一系列新的张力诞生了。在这些关於此种矛盾集体经验的政治意义与制度节点的抗争中,新的张力成为了抗争的特徵——在这样的抗争中,除了其他政治立场外,还出现了新一轮的极右运动。

> 後忧郁威权主义

社会分裂的日益增长,也许可以解释新右派的崛起原因,以及其为何以对情感共融的强烈期望为特徵。这与2010年代的社会运动中发生的情况类似。沉浸於异质群众里的经验,作为一种不明确的「共同点」,使得更加强调调统一和排斥的国家共融概念有了空间——例如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或是 Bolsonaro 说的「巴西至上,上帝至上」。

这种政治型态是面对社会崩解而产生的,是一种侵略性的、反动的回应:其认为只有将无关的、腐败的事物排除甚至消灭,情感的团结才可能实现。不管对象是连结着左派的「共产主义者」、连结着种族化贫穷的「罪犯」,还是连结着女性主义与LGBTQI+运动的「家庭的敌人」,皆是如此。

然而,新的极右派不仅透过推进不同形式的道德讨伐来应对情感分裂,其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回应规范性去合法化的概念。此概念是在2008年的危机和2010年代的政治抗争後,逐渐受到瞩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认为社会机构有问题,并不是因爲其体现了如忧郁症秩序这类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而是因其反映了我们将生活在一个「自然」规范失去效力的世界中。威权主义的主体对於宿命论状态的反应,与其说是面对一种可感知的无政府状态,不如说是因应着不再

成立的规范形式——其不再能为社会关系提供 秩序和稳定。

这就解释了为何这样的政治观点不像过去的集体欢腾经历那样,以停止现有的规范为导向,反而是倾向建立一套压迫的秩序。为了回应解体、不稳定且反常的社会,威权主义者宣称,政治共同体可以为此情况带来解方,并且应寄望於可持续的、有效的强制性与暴力性规范。

除了威权主义之外,新极右派也经常扬言要推动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再激进化,在巴西的案例中这种状况尤为明显。这即是後忧郁威权主义的悖论:在回应新自由主义主体性危机,并从中汲取反对力量时,其也透过各种方式,尝试继续甚至激化这种主体性的形式。其主张,要藉由将「忧郁」的状态推回正轨以超越忧郁;而这种矛盾的结构,正是其具有潜在的、巨大破坏力的原因之一。

於此,威权主义和激进新自由主义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或着说,後忧郁的方式——融为一体。两者的政治结盟,一方面导致一种概念,即是情感共融的创造,是立基於排除、消灭那些反抗腐败的企业家自我,以及拒绝做一个「好公民」的个体与群体之上的。另一方面,其塑成了另一个理念,即唯有坚决、甚至暴力地确保「市场法则」的执行,才能创造一套足够有凝聚力的规范性原则。任何其他的选项,都是不被接受的。

> 忧郁之後?

如果将这种新威权主义和激进新自由主义的结合,视为当前形势带来的唯一或主要视野,那肯定是一种误导。虽然我无法在此文章中进行,然而我们需要更全面的分析,并关注其他政治方案如何应对企业化忧郁主体性的危机;此危机的张力,可以说正随着疫情爆发而更加强大。无论我们在面对这个议题时,采取什麽样的集体行动,都必考量到这些由上述情境带来的、正持续开展的张力与抗争。

來信寄至:

Arthur Bueno <oliveira@normativeorders.net>

> 隐形劳动的视觉再现

Jenni Tischer, University of Applied Arts, Vienna, 奥地利

於 COVID-19 的应对措施,许多人正经历社交隔离、远距教学、分离或是在不同的环境中独处。乍看之下,我们也许会将之视为「我们」共同经历的、一种集体的经验,甚至尝试从全球作为集体的角度来思考。然而,根据我在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担任讲师的经验,我并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的可能性。如今,个人在公共场域行动的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此一特殊的情况也重新凸显了政治和社会方案将可能带来非常广泛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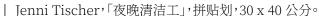
学校和大学等学习、体验用途的集体空 间,以及公园和操场等公共空间,目前仍只有部 分开放使用,这使得人们将生活重心转移到私 人空间。人们失去工作、没办法把小孩送去托 儿所,相当於失去了一个有花园的周末住宅,只 能被限制在自家的狭小空间里。统计数据显示, 心理和身体上的家庭虐待现象剧烈增加,性别 分工问题重上台面。COVID-19 从根本上向我 们展示,社会的运作有赖於系统相关的劳动,以 及与生育有关的劳动类型。我们都依赖着那些 有偿或无偿的照护劳动者。每一具身体和其周 遭的环境,都需要培育、梳理、清洁、喂养、 爱护、照顾、拥抱、关注、治愈、再生。我也 想在这里指出,「与系统相关」的概念是有争议 的,因为这样的概念同时也代表某些工作与「系 统」不那麽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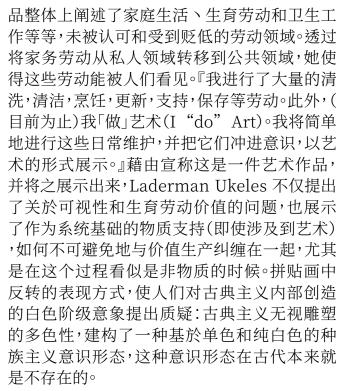
正如我们所经历的,由於媒体对那些确保 我们能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工作,开始有更多 的关注、超市员工突然成为了可见的存在,人 们也因此出现了像是鼓掌等表达感谢的举动。 我的学生 Nora Licka 的论文,探讨公开展现的 集体姿态,以及作为政治行动的团结现象,两者 之间具有的差异。她的结论是,公开的集体赞赏 行为是一种有力的姿态,可以改变人们的思维 方式、为其带来希望和力量,让他们能继续前 进。然而,这样的举动并没有办法为超市、医院 、日间护理中心等机构的劳动者提供更好、更安全的工作条件,也无助於实现长远的平等,或是更好的薪酬和更短的工时。此外,当我们讨论什麽才算是「系统相关」的工作时,我们会发现,有许多工作一直是不被看见且无偿的;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劳动在私人、家庭领域,或是在夜间进行。

在此背景下,我要介绍并讨论我2020年的 两幅拼贴画,「夜晚清洁工」(Nightcleaners) 以及「服务」(Service)。在拼贴画「夜晚清洁 工」里,你可以看到从The Berwick Film Collective 的实验性纪录片一 Nightcleaners (1972-75) 电影剧照中所截 取的剪影和人物;以及两座躺着的大理石雕 塑,由一张纪录 Hartford Wash: Washing/ Tracks/Maintenance: Inside(1973)这场 表演的相片中撷取而来。这场表演由艺术家 Mierle Laderman Ukeles 在哈特福德的沃 兹沃思学会博物馆进行。The Berwick Street Film Collective 一开始的想法,是要让一群 移民和工人阶级妇女与女性主义运动者联合 起来;其中一位艺术家, Mary Kelly 是电影小 组的成员,同时也作为女性主义运动者参与了 Nightcleaners 的活动。最早的概念之一,是将 实时纪录片作为一部持续时间约8小时的影片, 其中只呈现一位女性清洁厕所的过程。藉由撷 取 Nightcleaners 的剧照,拼贴画透过静止的 画面,呈现女性清洁工在夜间清理上班族留下 的脏乱,所具有的潜在无止尽与重复性。在女人 的脚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躺在地上的白色大 理石雕塑,作为前述清洁厕所画面的双重图像, 以一种放松的姿势呈现在相片中。

在美国艺术家 Mierle Laderman Ukeles 表演纪录照片的背景中,可以看到这个雕塑。这 场表演的内容,是艺术家清理博物馆地板。1969 年,这位艺术家发表了《维护艺术宣言》,其作







「服务」是另一幅由报纸上的图片组成的拼



│ Jenni Tischer,「服务」,拼贴划,30 x 40 公分。

贴画,描绘了一个女性在另一个戴着耳机的女性前面打扫。正在打扫的女性身着蓝色制服,是由背面呈现;另一个图像中的女性则朝着我们微笑,看来是代表着愉快且友善的服务人员。这幅拼贴画强调的是,就如鸡毛掸子和吸尘机器人在拼贴画上的结合所代表的那样——即使技术、设备能够改变,要藉着使用不同的形象或设备,来为服务业劳动的价值化带来改变也是不可能的。表现、价值化、隐形劳动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仍需被强调并得到解答,人们如何藉由阶级、种族与性别去定义何谓「肮脏工作」,其背後的结构才得以被处理。

來信寄至:

Jenni Tischer < jenni.tischer@uni-ak.ac.at>

>疫情中的家庭暴力

Margaret Abraham, Hofstra University, 美国, ISA 前主席(2014-18年), ISA 种族主义、国族主义、原住民和种族研究委员会(RC05)、移民社会学(RC31)、妇女、性别和社会研究委员会成员(RC32)、人权与全球正义(TG03)和暴力与社会(TG11)



危机和不确定时期,家暴增加这一事实已得到充分证明。当前的 COVID-19 全球疫情也不例外。自 2020 年 3 月以来,新冠病毒已导致全球的封城、居家防疫、就地防疫等命令,政府强制要求限制人们的行动。虽然这已被证明是减缓病毒传播的必要步骤,但它

却导致了家暴问题像疫情一样 蔓延。讽刺的是,对公共健康和 安全至关重要的隔离政策对於 处於家庭功能丧失和暴力对待 的人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安全。 同样由疫情引起的经济和精神 压力导致了一些以前不存在的 家暴事件。对那些受虐的人来 说,疫情的封锁加剧了暴力,在 某些情况下甚至导致死亡。 來源: Flickr/Jane Fox.

家暴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 行使权力和控制的展现,它可 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现:身体、 情感、言语、性、心理和经济 上的。 然而,虽然家庭暴力发 生在所有社群中,但不能一概 而论。每个案例和关系都有自 己的权力、优势和控制上的脉 络差异。 基於种族、民族、阶 级、性别、性取向、种姓、文 化、年龄、地区、宗教和移民 身份的交织,也存在复杂经验 的差异。研究显示,家暴在微观 到宏观层面对弱势族群产生了 更严重的影响。 COVID-19疫 情已经证明这是正确的,因为 弱势群体在失业、经济困难和 感染方面承担了更多(例如,那 些第一线接触病毒的高风险工 作,但/或同时缺少医疗健保 资源)。

>疫情状况

自 2020 年 3 月以来,来自 多个国家的报告显示,实施的 封城和各种限制措施加剧了性 别暴力,尤其是针对妇女和儿 童的暴力行为。 那些遭受虐待 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难以逃离, 这样导致他们与朋友、家人的 这样导致他们与朋友、家人的 离。这样的情况使施虐者能对 受害者持续地监视和控制,并 通过限制食物、衣服、医疗保 健和卫生产品的获取来监视和 约束他们。疫情还无意中阻碍 了急需社区和心理健康资源的 人或取帮助的机会。恐惧和缺 乏可行的替代选择也迫使受虐 者与施虐者待在一起。

疫情减少了我们很多制度 性的和社会的支持。虽然权力 和控制仍然是家庭暴力的核 心,但疫情带来的压力和困难, 包括粮食不安全、失业、恐惧 和焦虑、沮丧、抑郁、疏远和 悲伤更加剧了这样的情况。学 校和托儿机构的关闭在各个层 面加剧了这种压力,加重家庭 负担;也增加了受虐儿的风险。 疫情中家暴受害者在家庭沟通 和寻求帮助有了更大的挑战, 尤其是实体办公室因疫情关闭 而只能上网求助的情况下。然 而,疫情也促使一些组织开始 创造性地思考新的方式来接触 和提供急需的服务。

疫情爆发初期,这个问 题受到了重视。联合国秘书长 António Gutierres 呼吁各国 政府采取措施应对家暴激增的 问题,并解决妇女的安全问题。 许多团体和社区组织以及反暴 力组织一直以多种方式回应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美国,全 国家庭暴力热线报告指出,与 2019年同期相比,2020年3月 16 日至 5 月 16间来电总数增 加了 9.5%。它还记录了施暴者 如何利用 COVID-19 讲一步控 制和虐待受害者。现在那些施 暴者虐待和控制行为的方法还 有拒绝提供食物以及扣留基本 的健康照护物品,例如肥皂、 消毒剂和口罩。在一些国家,由 於获得法律系统和其他支持系 统如警察、收容所和法院的机 会有限,而且收件被疫情延误, 因此施虐者对受虐者的管辖权 不减反增。对於移民来说,担心 被驱逐出境进一步加剧了这种 情况。在疫情期间,国家着重於

内部和外部移民问题的政策和 做法忽视了遭受家庭、以及基 於性别的暴力的人。

由於处理家暴组织在疫情期间还是要遵守政府防疫规定,因此他们不得不改变工作方式来支持受暴幸存者。在纽约的南亚妇女之友(Sakhi for South Asian Women)执行董事 Kavita Mehra 解释说:

「在3月和4月期间,虽然 纽约市实施了就地保护令,但 南亚妇女之友服务的社群是那 些受害最为严重的。从我们的 团队与那些,特别是住在布鲁 克林、皇后区和布朗克斯的受 暴幸存者对话中,他们看到暴 力形式不断升级并变得更加极 端。与此同时,他们正在应对疫 情带来的意外经济影响,以及 导致前所未有的住房、食品和 公共设备的不安全比率前所未 有。联邦政府预算的有限支持 让一些幸存者松了一口气,无 列册登记的受暴者/或仍与施 虐者共用银行账户的受暴者得 不到保护。为了支持我们的社 区, Sakhi 在 2020 年 3 月至 10 月期间分发了超过 130,000 美 元的紧急援助和近 16.000 磅 的食物。」

一些防止家暴组织发现, 由於人们在家庭的限制面临恐 惧和缺乏隐私的困难,因此他 们没有接到那麽多求助电话。

> 社会学者能做甚麽?

解决家庭暴力问题不能等待疫情过去。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必须在全球社会学的脉络下,与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政策制定者、运动者和其他厉害关系人一起制定方案,以结束与性别相关的暴力,并带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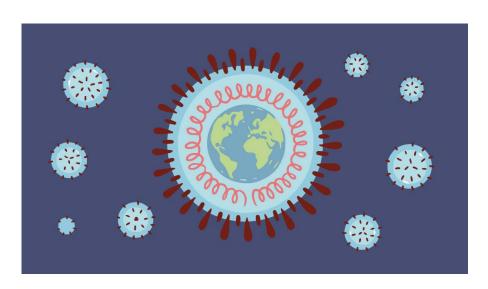
结构性改革。我们需要更好的 方法来收集和报告数据。我们 需要了解在 COVID-19 期间 影响家庭暴力的社会、经济和 政治动态,我们必须用这样的 认知来采取行动。是什麽阻碍 或协助妇女和儿童在灾难期间 远离暴力?我们看到了哪些挑 战和成功?利用交叉方法,我 们必须使用我们的知识、理论 和分析来突显、行动和介入这 些议题。我们需要支持那些正 在寻找创造性方法来解决这些 现实问题的组织和倡议者。在 人类历史的这一时期,我们自 己必须重新构想如何应对家庭 暴力和所有性别暴力。受暴的 妇女和儿童在封城期间受困家 中,而情况迫在眉睫。解决家庭 暴力问题不能等待疫情过去。 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必须在全 球社会学的脉络下,与科学家 、社会科学家、政策制定者 、运动者和其他厉害关系人一 起制定方案,以结束与性别相 关的暴力,并带来结构性改革。 我们需要更好的方法来收集 和报告数据。我们需要了解在 COVID-19 期间影响家庭暴力 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态,我 们必须用这样的认知来采取行 动。是什麽阻碍或协助妇女和 儿童在灾难期间远离暴力?我 们看到了哪些挑战和成功?利 用交叉方法,我们必须使用我 们的知识、理论和分析来突显 、行动和介入这些议题。我们 需要支持那些正在寻找创造性 方法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组 织和倡议者。在人类历史的这 一时期,我们自己必须重新构 想如何应对家庭暴力和所有性 别暴力。受暴的妇女和儿童在 封城期间受困家中,而情况迫 在眉睫。■

> 來信寄至: Margaret Abraham

<<u>Margaret.Abraham@</u>Hofstra.edu>

> COVID-19 危机下的 新社会学与女性主义

Karina Batthyány, CLACSO 执行秘书, 烏拉圭, 以及 Esteban Torres,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órdoba-CONICET, 阿根廷



社会科学而言, COVID-19 疫情蔓延的巨大危机带来了新的观点,即认知到我们很难去否认自己虽然生活在一个个地域性社会,却越发与全球相互依存。2020年之前,社会研究还能为自己避免全球观察框架给出可被接受的理由,但是情况已不同以往。这场疫情开启了一种不可逆的、没有回头路的关注过程,其最终将对所有的研究主题带来影响。

如果我们继续无视全球社会的存在,将会陷入严重的不合时宜。如果说航海时代征服美洲开启了物质的全球化,那麽 COVID-19 呈现於数位萤幕上带来的打击,很可能会将全球化永远地转变为日常。因此,与其说COVID-19的化身扩大了物质全球化的进程,

不如说COVID-19化身的集体进程,正为精神全球化的进程带来扩展。我们并非在见证微观社会中正衰落的感觉和主观奇异化,而是在一种垂直、陡然、难以想象的状态中,结束了对於作为社会核心的世界动态,长久以来的无知和历史性否定。

> 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机制

知识生产议程的机制如何转变,并不是未知的。社会变迁通常是依循着两种原则。首先,是历史事件和过程,决定了社会科学中知识生产的准则,而不是反过来运作的。COVID-19的传播作为一个「外部」和客观的事件出现,大地影响了社会科学领域。四十年前,另一个「外部」地域性事件的发生——也就是南美

| 來源:创用CC。

军事独裁政权下兴起的灭绝系统,瓦解了社会学的自我生产条件,中断其自1960年代以来急速开展的全球化冲击。

其次,常识是先於科学,後 来才被科学吞噬的。这种新的 全球归属感仍处於萌芽状态, 还没有办法以新的理论和分析 工具以及实际行动来重新为自 己编码。如果我们决定认真面 对COVID-19的现象、全神贯 注地沉浸其中,我们就应该要 完全地让它席卷而来。作为社 会科学家,我们通常愿意以某 种平静的心态,去承担「真理只 是暂时的 这样的前提,却不愿 承担这种肯定所带来的严重後 果。每一个被创造的观点和思 想,都需要被完全摧毁或自我 毁灭,并得以再次被创造。这是 避免舒适地生活在已知假象中 的唯一方法。

> 世界社会的新理论

正如世界社会不是单一位置的产物,世界社会的理论也不能是如此。一个世界社会可能类似於一个高阶网络,其能够区分、整合和连结整个国家、地区和全球的社会场域。我们可以假设,世界上的每一个

「COVID-19的世界危机使我们有机会在创建世界社会的新理论方面取得进展,以便所有社会学从每个历史地点更好地面对社会、性别和经济不平等的日益全球化。」

社会节点,都是这三个相互作用的领域直接/间接的独特凝结。德国的全球社会与阿根廷、乌拉圭、墨西哥、智利或中国的社会肯定有所差异;但所有的国家,都在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构成了世界社会。单一的父权制或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存在的是具体的父权制模式,以及世界社会中,中心资本主义和边缘资本主义之间不同的主体动力。

肯认这套至关重要的差异 性原则,并不会使发现普遍规 律性的可能消失,却能够确实 将结构性的关系与过程,以及 把不同地点视为具有相同模 式的可能降至最低。认识到社 会的主要构成是世俗的,即意 味着: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的物 质性也是世俗的。1960年代以 来,拉美社会学不再是社会学的 「他者」,也不再是其简单的异 化再现;而是世界社会学的一 股活跃潮流。在这个意义上,我 们认为,真正需要构建的世界 社会理论,应该关注的是如何 介入地区的新兴知识群体,在 自身看待差异化总体的观点, 以及来自其他位置的观点之间 取得平衡。并且,从这样的实践 中,使必要的人类学行动得以 可能,尝试真的「将自己置於他 者的位置」。从这样的观点出

发,世界将不是关於「收集所有 现有知识」的征服,而是藉由创 造一种新的全球对话,我们得 以考量到由每个历史位置的节 点而产生并投射的世界观中, 形塑新的结合。

COVID-19的世界危机,使我们有更多机会,为社会学创造新的世界社会理论。新的全球视野将使我们能够从每个具有历史性的位置出发,更好地面对社会、性别和经济不平等的日益全球化。对批判女性主义观点来说,更全面的全球化视野,无疑将为其结构性社会转型计划带来助益。这将会是一个,对政治运动的物质部署进行知识调整的过程,而政治运动本质上即是全球性的。

对於现代批判社会学来说,这个问题更为复杂。其观点的进一步全球化,并不一定会导致社会参与科学,更不会导致潜在的改革性社会学。为改理解为何数十年来,这样的改革性观点,并没有产生学术的政治效果,我们必须进一步对现代批判社会学的发展与政治域等之下是有必要的。现代批判社会学的发展与政治或不可分,并试图寻求与运动和国家政党政治的新连结。这和离

开学术舒适圈的议题有关,就如同1970年代之前的社会学潮流——至少在拉丁美洲是如此——以及现在的女性主义批判思想。为了面对并处理国家政治,我们需要的是一套整合现实的原则;对於以批划家的原激进主义,以及极端完全的原则;对於以及极端完了的原激进主义,以及极端完了的原激进主义,以及极端完全的方面,这将是最好的应该如何「为了所有人」走员的企业的这种政治转型,也是与女性主义进行有力建设性对话的必要条件。

这些目标如何达成,将取决於我们建立一种知识、科学和政治社区的能力,在这样的实践中,我们能够藉此构成具有足够力量的集体倡议,以促成结构性的改变,进而改变社会在这个动荡时期的进程。

來信寄至: Karina Batthyány <<u>kbatthyany@clacso.edu.ar</u>> Esteban Torres

<esteban.torres@unc.edu.ar>

> COVID-19 骇人的

全球影响

Mahmoud Dhaouadi, University of Tunis, 突尼西亚, ISA历史社会学 (RC08)、宗教社会学 (RC22)、言语与社会 (RC25) 研究委员会成员



COVID-19大流行病袭击了人类集体存在最基本的社会要素:社会互动。社会隔离将如何影响我们未来的日常生活? 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各层面来说,新冠病毒疫情是非常不寻常的全球灾难事件。特别是在先进社会中,疫情也引来了医疗专家赶至前线,帮助减少死亡人数和感染率。其中一些地区和其他地方已不止一次被迫大规模封城数周,

美国和英国是最先开始的例子。因此,这股危机应当成为社会科学家的首要关注点,不仅是从量化,还必须从质性角度进行分析。这类分析对於改善地球当前和未来的状况而言,可能非常地重要。

> 社会科学必须关注自身

COVID-19的疫情冲击了人类集体生存最基本的社会范畴:社会互动。「待在家里」的口号已成为了大多数国家会使用到的关键词,而正常的社交互动已在全球各地停摆。在社会内部、社会之间的正常社会互动已经与以往不同,也几乎不可能排除新型冠状病毒在未来所带来的影响。病毒在目前全球各地的出现以及它未来几年的潜在持续性,可能会成为主流人们与社会生活形式里的一部分。

COVID-19的疫情导致了 一些特定的问题。在社会学下, 骇人的疫情产生了一个新的 全球社会问题,社会科学必须 为此找出新的概念并构想新 的工具,像是一些与已故社会 学家厄文·高夫曼(1922-82) 不同的思考方法。高夫曼的符 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像是给了我 们一本全新的社会学概念词 典,其有助於理解面对面互动 的微小细节。然而,在持续的全 球疫情之中,需要发明潜在的 新社会学概念来分析这波疫 情对人类的数种後果:生活的 不确定性、失去对事件的控制 、只关心眼前的现在。 质性社 会学可能更活合处理这些新特 徵。然而,社会科学背负的却是 双重的任务:

首先,我们需要研究目前 COVID-19 疫情对人们行为所 造成的社会和心理影响;以及 自 2019 年 12 月以来那持续经 历危机的社会,其中的不同动 态。《科学人》杂志在其 2020 年 6 月和 7 月的期刊中将焦点关 注於,新冠疫情对人们的社会 和心理影响:「人类如何面对逆境:我们从疫情中学到什麽?」 六月号强调了公私立医院和诊所的医生、护士们所面临的压力。然而,在 2020 年 8 月的一期中,该杂志反而对冠状病与其中提及社交距离是在动物之间的一种自然现象,动物以此避免被其他生病的动物感染。虽然这可能是真的,但从长远来看,对於正常的「人类」社交互动来说,社交距离显然仍存在着问题。

其次,如果在未来几个月 或几年内找不到根本性的解决 方法,现今的社会就必须要去 设想,在疫情持续下世界中的 社会生活样貌。为了应对疫情 的後果,这两种类型的研究结 果都会部分地开创与当前主流 社会科学不同的新社会科学。 而新冠疫情的其他主要特性, 正在对社会中的社会团结产生 影响。西方先进社会被描述为 个人主义的,据说社交媒体网 络更强化了这种个人主义。而 社交距离以及其他偏向社会隔 离的抗新冠病毒措施的伦理与 实践,必将在这些社会还有非 西方社会中加强个人主义和孤 独感。 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 看到,这种对个人、团体、集 体和社会之间的正常社会互动 所产生的全球性破坏。

> 气候变迁和仇恨言论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与COVID-19疫情相关的大问题: 气候变迁和仇恨言论。一些分析人士将新型冠状病毒所带来的疫情解释为:人类在地球上的所作所为所导致的全球性污染。而这些污染对於气候变迁会产生负面影响,或是像一些 当前的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很可能会产生新型的危险病毒,以上正是以最初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中国城市,武汉为例。无论新型冠状病毒出现的原因是什麼,全球性的病毒感染正是一个令人费解和眼花缭乱的独一个它促使了现代科学家必须在他们的学科实践中更加谦逊和谦卑。在他们的科学伦理之下首先必须做到的,就是最小化他们科学工作可能会导致的潜在问题。

至於世界各地的仇恨言论 现象,在 COVID-19的疫情期 间和疫情结束之後都很可能会 呈现增加的趋势。仇恨言论是 一种基於他人的宗教、肤色、 性别和种族去贬低、虐待或是 排挤、歧视他人的行为。仇恨 言论的出发点通常是抱持着一 种对个人、群体或整个社会或 文明感到不悦或敌对的态度, 而预计「新型冠状病毒」将会被 添加至会引起仇恨言论的清单 之中。受新型冠状病毒严重影 响的国家的公民们,他们在出 国旅行之时将会遭遇越来越多 的歧视和仇恨言论。因此,正如 世界卫生组织在 2020 年 8 月 所预测的那样,全世界的旅游 业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且 在未来几个月或几年,这份冲 击还会持续下去。有一个悖论 是,现今全球性的 COVID-19 疫情本应使我们的社会团结起 来,但它对歧视和仇恨言论几 乎不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因此, 全球旅游业在现今会受到影响 的原因,很可能不只是受到流 动性的限制,还可能是因为仇 恨言论和歧视在全球潜在地增 加的缘故。■

> 來信寄至: Mahmoud Dhaouadi <m.thawad43@gmail.com>

> 後疫情时代的假想情境: 从调适到集体学习

Alejandro Pelfini, Universidad del Salvador, 布宜诺斯艾利斯, 和 FLACSO Argentina, 阿根廷



來源:创用CC。

然我们还处在 COVID-19疫情当 中、它的影响和 损害依然难以计算,且对它 完全进入掌握之中的预估日 期也犹未可知,但社会科学 并没有停止思考後疫情世界 可能出现的情况。全球危机 的影响之深,以及疫情对日 常生活和资本主义运作上前 所未见的影响,是如此剧烈, 以至於本文的反思超越了对 疫苗可用性的猜测、公共卫 生系统的重组和世界卫生组 织内部的国际合作。相反地, 考虑到疫情是一项重大的文 明挑战,本文将着重於在极 端情况下进行真正学习的能 耐,以及整个社会面对创伤 的情境、社会和人们共享前 所未有的结构脆弱性时,所 需要的复原能力。

> 後疫情时代的可能反应

正如经济学家Branco Milanović所展示的,在其他超 出经济范畴、且对公共卫生造 成挑战的全球危机之後(或是大 战之後,例如1873年或1919年) ,国际体系和某些社会在其发 展模式和政治组织方面发生了 重要变化。因此,认为这次疫情 也将导致生产、消费和生活模 式发生重要变化,并不是乌托邦 似的空想,将会再次展现资本主 义和现代性适应新挑战和重新 省思自身的能力。当然,事情发 展也并非保证如此,而是取决於 行动的发起,首先进行反思,再 来便是促成这些转变的政治行 动。

目前看来,疫情以後的第一个反应,以及随之可能出现的情

境之一,是特殊主义的隐退。由 於某些国家(Trump 领导的美 国或 Bolsonaro 领导的巴西) 已经经历过这种情况,因此不 值得在这点上多做停顿。这种 反应是继续使一切照常进行, 并躲在民族国家的假象背後来 推广世间万物恢复常态,同时 无视疫情所造成的全球影响, 以及现状下和激进相互依存的 关系。相反地,探讨两种可能的 转型情境会更加有趣,这两种 可能情境将会取决於人类的能 动性和社会的反身性。我们可 以从这些能力中区分出两种等 级或程度上的转变:第一步将 和调适有关(可理解为依据环 境的新复杂性,调整自己的偏 好和兴趣),以及第二个,即门 槛更高的集体学习过程(代表 以降低所造成伤害的道德义务 为原则,回头检视前述这些偏 好和兴趣的效度)。

> 调适

那麽,如何构想一个主要 的调适情境,其中三个基本社 会领域(国家、市场和公民社 会)针对一个更复杂且更具挑 战性的环境,发展出一套沟 通上的调整,同时无需重新思 考或完全放弃已经建立、却 确定有害的固有作法?在国 际层面,这将会是强化多边主 义。在国家层面,国家的角色 会更显突出,虽然在致力於公 共卫生的同时,国家会更加关 注证券化和对隐私的监控。从 市场上,我们可以预期到更多 的商业贸易保护主义和公共 投资;数位化的加深;促进科 学合作,但不改变对智慧财产 权的保护。并且,在某种程度 上,比起纯粹金融化,生产经济 (productive economy)和 所谓必需商品和服务将会复 苏。透过聚焦在公民社会,将 会促进负责任的消费、辅助性 原则(subsidiarity)和自我照 顾(self-care),并更加关注永 续发展,尽管是在低强度的民 主框架之内。

>集体学习

另一种具有更大改革潜力,但要求也更苛刻的反应, 是更深入的集体学习过程,这 需要超越谈判和国际合作的现 有秩序,进入全球治理的新领

域,专注於提供并保护公共产 品、降低风险和预防灾难。这 会反映在全国层级的公共政策 上,政策概念将围绕在照护和 降低使用公共财时的不平等。 在生产和消费领域,将推动短 途物流和在地贸易、生产,同 时强化小城市,并以「必需」活 动为基础进行重估的经济;最 後,同样很重要的一点是,现 今北方和南方在智慧财产权和 专利方面的纠纷,将为更平等 且包容的制度铺路。公民社会 将渐渐构成一个「产消合一者 (prosumers)」网络(J. Rifkin),全球在地化的水准 将会浮现,对性别差异敏感 的照护网络将会扩大;受到替 代理论,如後发展理论(postdevelopment)和去增长理论 (degrowth)的启发,将开启 转型的空间,使一个在平等使 用资源方面实现基本民主化的 政治化过程成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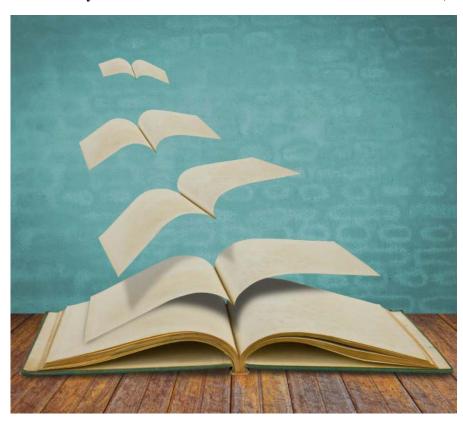
这些替代方案中,哪一个 更有潜力?哪些因素才能使 它盛行?我们已经意识到第 一种非转型反应的局限了,几 乎不可能指望它。然而,它终 究是一种可以考虑的选项,且 依然有它的拥护者。资本主义 和现代性已经展现了它们调 适和改革的能力,甚至还包含 针对它们最激进的批评(正 如 Boltanski和 Chiapello 在 《资本主义的全新精神(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中所展示的)。因此,「适应」是 最有可能出现的反应,且它将 会几乎机械式地发生在专业 体系、大公司(尤其是与数位 化有关的公司)和眼光狭隘的 政治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中。在 此同时,门槛最高的集体学习 将依赖社会运动和大众组织的 激进化和活化,这些运动和组 织需要不只做到一个伟大的援 助和预防健康风险计划,还要 放眼全球绿色新政的实现,或 是更好的,南方社会生态公约 (the Ecosocial Pact of the South)一在南北对话中,环境 正义将总是被视为社会正义的 一环,并放在一起考虑,且生产 性工作的中心地位将会首次被 生命优先所取代。毫无疑问地, 这个选项是最不可能的发生 的。但权衡利害之後,这也是最 急迫和必要的。■

來信寄至: Alejandro Pelfini <pelfini.alejandro@usal.edu.ar>

> 公民政治学领域的 社会学家

Fredy Aldo Macedo Huamán, Universidad Iberoamericana (IBERO)墨西哥城, 墨西哥





一开始,社会学家就参与了社会的公 共事务(例如 Émile Durkheim、 Max Weber \ Marianne Schnitger 和 Jane Addams),无论是警示广大群众不平 等、歧视和苦难等情形,以及社会上许多人遭受 的不公正、权力滥用、权利践踏和政府对公共 服务的忽视,或是激起学识的、有根据的公开 辩论。社会学家藉由运用通俗和刺激性的语言, 来参与相关的社会问题,同时不放弃批判性精 神和探索性的天职,寻求动摇良知和质疑权力。 最近,一位社会学家 Helen Jefferson Lenskyi 和前述的反思非常吻合。Helen将学者的角色视 为公共知识分子,并延伸至她所做的研究,她说: 学者「解决社会问题,例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带来 的破坏性影响,并寻求揭开社会问题根源和支 持它的压迫性体制。我们为社会改革提出建议, 并与社区携手合作、挑战当权者,有时我们会 成功,有时不会。我们挑战的对象通常都是「神牛 (sacred cows) 一例如奥运会或制度性宗教(并且存在着重叠)—我们的研究发现通常都会显示『国王没有穿新衣(the emperor has no clothes)』。」

今天,有一代充满迷惘但创造力无穷的社会科学家,面对这个动荡和不确定的时代,显得十分不安。他们对周遭公民和社群的日常生活十分敏感,力求使学术遗产能与实际情况一致,以创造一个创新和反身性的框架,协助我们面对当下的局势。我认为,正是这点促使 David M.Farrell 和Jane Suiter 投入爱尔兰社会,积极参与公民审议式民主的构成,并写成《重新构思民主》(2019)一书。他们的成果引起大家的注意,爱尔兰公民议会作为公民投票的管道,达成了堕胎和同性婚姻的合法化1。因此,平常出现在学术界的理论得到了社会的回馈,同时还探索了与行动者的连结,除了激发问题和议题之外,还使重新设计公有事业和文化的对话成为可能。

如果在日常生活层面,更多行动者集结起来参与政治社群的重大议题—提倡他们的利益和提出他们的要求,加强他们的学习、合作、组织模式,建立管道和行动计划,建立权力的空间,尝试包含参与管道和民主创新—他们身边还会有社会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愿意支持和推广他们。

> 社会学家的新角色

因此,在学术界和公民政治场域之间,企图 促进公民能动性的社会学家可以在当代民主国 家的多个行动领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有鉴於 此,社会学家的训练和实践,到底可以做出哪些 贡献、参与和反思呢?

整体而言,传统的学术/专业区分,已经远远不及如今更加复杂、相互渗透且多样化的领域和行动者体系。使这些特徵浮现的情境,仍然值得权衡利弊。

对社会学家而言,回应这些复杂性时,原则上应使他们的大学或研究中心更加贴近公民和政治行动者,同时考虑到他们的需求、限制、潜力和共同框架。其次,在这些不断变化的领域中,社会学家自身的经验,将有助於他们依据过往的情况对现行计划进行测量和改善,吸取教训,从而促进适合公民的教育意义创新和专业知识。

在民主政治和公民实践层面,社会科学值得考虑的一种形象是作为「公民顾问/调解人(citizen consultant-mediator)」的社会学家。

透过参与公民部门,社会学家需要借助自身 杰出的分析操作能力来推广愿景和成效,并以创 意的、教学的、对话的、命题的和情感的技能, 佐以激发自我探索、动员力和复原力的方式,来 辅助公民和政治行动者(或与之共事)。同时,社 会学家进行参与的指导枢纽,来自对民主生活关 键价值(正义、自由、多元化、宽容、团结、批 判和异议、凝听和合作)的道德坚持。

更具体来说,这些新社会和政治部门之所以出现的先决条件,暗示它们将会容易吸收:

- ·在组织内部(或共享的)进化的过程中,获得更好的元素、技能和经验,也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以民主的方式精进自己;
- •对於他们的目标和具体化围绕他们认同的理想

(根据民主价值和人权),会有专注和持续地有所讲展:

- ·假想一个「公民游说(citizen lobbying)」平台,目的是制定一项受社会学家影响、并在他们离开以後,重新配置政策的计画;还有
- ·清楚揭示他们可以达成的贡献,也就是针对不同领域落实民主实践(与其他社会行动者和专家合作),将僵化的体制框架重新导向为将国家和公民联系起来的包容性和创新方式。

至於社会学家方面,这种工作的重要性和核心地位十分显着;他们将成为:

- ·论述、叙事和想像的「解码者(decoders)」, 以便他们能对更重要的通讯、文化和政治项目 进行再加工;
- ·针对根源於组织内部或外部的冲突和张力,担任「调解者(mediators)」;
- ·在对抗公共和私人权力时,作为政治、民事和公共行动过程的「陪伴者(accompaniers)」和「翻译者(translators)」;和
- ·公民、民主和公共政策方案的「表达者(articulators)或共同起草者(co-generators)」,这些方案未来也会被与他们合作的公民团体采用。

简言之,在如今盛行的两种严重威胁一极右 翼民粹主义和科技公司的巨大力量(与政府监控 系统相关)一之间,公民需要以清晰和积极的态 度回应它们,阐明他们的民主声音和治理能力, 这将会强化并变得可以持续。因此,由於迫切需 要更新民主方案,公民将寻求重新定位政治学习 \知识整合、公民友谊和组织方向。此外,他们 还需要和其他行动者建立桥梁,包括社会学\政 治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从事者,他们将会乐意地 参与其中,结合争论的\有共感的方法,并带着 充满活力和自信的冲劲。

> 來信寄至: edo Huamán

Fredy Aldo Macedo Huamán <fredy.macedo@gmail.com>

 $1. \begin{tabular}{ll} 1. \begin{tabular}{ll} \pounds \begin{tabular}{ll} https://blogs.lse.ac.uk/politicsandpolicy/irish-referendums-deliberative-assemblies/ \end{tabular}$

> 千里达及托巴哥沈默的 亲密伴侣暴力

Amanda Chin Pang,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St. Augustine, 千里达及托巴哥

千里达及托巴哥,当女性、男性或儿童受到亲密伴侣之间的暴力或因帮派相关的战争而死亡时,这会马上引起大众的关注。然而,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哭泣声却立刻安静了起来;施暴者仅仅对他们的暴力行为提出陈腐的托辞,留下迫在眼前、永无止尽的虐待厄运。

在千里达及托巴哥,即使女性、男性和儿童在亲密伴侣暴力和性别暴力下被杀害,人们仍始终保持着沉默。一位名为 Andrea Bharatt 的妇女的死去,成为了一种充满希望的催化剂,释放了受虐待暴力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哭声。

> 暴力的文化

自从COVID-19疫情「待在家里」的呼声以来,家庭暴力案件就增加了不少——有时「家庭暴力」会被同义地指称为「亲密暴力」——而事实上许多家庭暴力的案件都发生於成年的亲密伴侣之间。

受害者的沉默加上他们难以逃避暴力的情况,让我想到了一种深植於千里达及托巴哥人的暴力文化。注意到这些情况的朋友和亲戚们都被口套盖住了嘴,让我意识到了这些情况。我认为这种面对暴力的沈默深植於殖民主义,且应当被终结。Bergner(1995)的研究:〈那个蒙面女人是谁?或是 Fanon《黑皮肤、白面具》中性别角色的作用〉(Who Is That Masked Woman? Or, the Role of Gender in Fanon's Black Skin, White Masks)就强调了这一历史背景,这不只是系统性的种族主义,还有女性臣服於男性所处的劣势地位。尽管亲密伴侣暴力严重地威胁到了伴侣彼此及家里的其他成员,但在缺少对亲密伴侣暴力的直接政策和研究的情况下,让我开始认为一些加勒比人已经过於适

应这种暴力模式。我将其称之为「暴力文化」,正如 Brereton (2010) 在〈千里达及托巴哥暴力文化的历史背景〉(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the Culture of Violence in Trinidad and Tobago)中所描述的那样,因为这种文化已在这个国家里变正常了。

> 正常化的暴力

我们可以围绕这个现象思考许多问题。亲密伴侣关系中的暴力行为已在加勒比地区的互动中正常化。到底是什麽导致了像千里达及托巴哥这样的小型双岛共和国内的暴力行为正常化?是因为无法处理伴侣关系上的瓶颈,还是亲密伴侣可以接受这种暴力?或是两者都有?千里达及托巴哥的文化为何似乎助长和纵容了这种暴力,所以才没有引起公众抗议?亲密伴侣暴力是否被视为私人的感情问题?不管男性或是女性都害怕吗?

亲密伴侣暴力在全球的许多伴侣之间都很 普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受暴妇女的统计数据 显示,三分之一的女性可能会在亲密关系中遭受 亲密伴侣的暴力,而全球 38% 的女性谋杀案是 由男性亲密伴侣所为(世界卫生组织,2017)。虽 然这些统计数据反映了男性对女性亲密伴侣的 暴力行为,但也存在着女性对男性的亲密伴侣 暴力行为,以及同性关系中的亲密伴侣暴力。美 国全国反家庭暴力联盟(2020)指出,九分之一 的男性都曾经历过某种形式的亲密伴侣暴力、 性暴力或跟踪。此外,根据这份报告男性的强暴 受害者和非合意性暴力的男性受害者,主要都是 受到男性施暴。这反映了千里达及托巴哥中类 似的情况。 Le Franc等人(2008)在「三个加勒 比国家的人际暴力:巴贝多、牙买加、千里达 及托巴哥」(Interpersonal violence in three Caribbean countries: Barbados, Jamaica,

「在表达自我和关系中,把反对暴力和认为暴力是不可接受的和不正常的作为一种规范,将打破沉默,并最终改变亲密伴侣关系,使之更好。」

and Trinidad and Tobago)中,提出了关於千里达及托巴哥身体和性暴力证据的报告。研究显示47.7% 的男性在人际关系中曾遭受过肢体暴力,而52.5%男性曾遭受过性威胁。

有趣的是,根据 Wiltshire(2012)在「加勒比地区的青年男子气概和暴力」(Youth Masculinities and Violence in the Caribbean)中的说法,男子气概是透过权力来习得,并通过世代、宗教、学校、媒体和朋友等家庭社会化的过程获得加强。此外,Wiltshire指出,男子气概是透过暴力和侵略的行为来表现,也因此一些男性会认为女性有时需要受到男性伴侣的管教。虽然男性和女性都是亲密伴侣暴力的施暴者,但千里达及托巴哥的新闻报导总是充斥着女性被她们的亲密伴侣杀害的事件。这是因为比起对男性伴侣实施暴力的女性,对女性伴侣实施暴力的男性比例更多。

男性和女性共有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观念,反映了亲密关系中无法避免的男性暴力,以及他们对这个问题的默许。此外,当女性不符合加勒比地区对女性的期待时,人们会把她们标记为「不像样的」,虐待也因此被视为是合法的。然而,透过男性的观点看待女性如何表达性欲和女性气质这点,从来就不是可以被滥用的藉口。

>「沈默」是解决亲密伴侣暴力的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许多人正在努力打破这份沉默,让受害者发声。千里达及托巴哥工商会的工作场所家庭暴力政策(2018),以及千里达及托巴哥警察服务的性别暴力部门都是解决亲密伴侣暴力问题的政策。联合国的聚光灯倡议(Spotlight Initiative)将焦点集中在因疫情而增加的家庭暴力事件。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千里达及托巴哥中的暴力文化以及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观念,仍反映了该国对暴力文化的普遍接受。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安全的支持机制,为伴侣们及施暴者提供治疗的选择,促进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健康,此外也同时呼吁男性们勇於伸出援手。以此来鼓励那些经历过亲密伴侣暴力的人,帮助他们充权如此一来,就可以使这默许暴力的文化,成为大家能够勇於说出「不」、能够公然拒绝暴力的社会。

此外,男性和女性在性的表达方式和性别 角色方面,有重新社会化的必要。我认为亲密 伴侣暴力给受害者甚至是施暴者带来的耻辱 和恐惧,再加上受暴者在受害者心理下的错误 责任感,导致了这种对暴力的默许。因此,根据 Wallace(2019)在「家庭暴力:千里达及托巴 哥发生亲密伴侣暴力而未向警方报案的情况」 (Domestic Violenc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ization Non-Reporting to the Police in Trinidad and Tobago)一文中, 男性和女性的家庭暴力受害者难以向警方报案 的主要原因是尴尬、羞耻。然而,尽管有这样的 原因,所得到的总是沉默的回应,而这类事件通 常是以谋杀案告终。

若我们能公开反对暴力,并将自我表达和人际关系中的暴力视为一种难以接受的异常行为,在这些事情都常态化後,将能够打破这些沉默并改善亲密伴侣关系。■

來信寄至: Amanda Chin Pang <amandalall91@gmail.com>

> 论关照世界的能力

Francesco Laruffa, University of Geneva,瑞士



个体应该被视为「媒介」,他们共 同决定了社会变迁的走向。 七岁的 Matteo Laruffa 绘。

冠疫情滋养了关於「後疫情世界」和「我们要的未来」的诸讨论。此类讨论的核心理念是:疫情不仅是新自由资本主义及其固有的对自然的过度剥削所带来的悲惨後果,它还同时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社会及其管理方法的机会。尽管如此,对这个想像的未来,至今尚欠共识:有者推动「包容性绿色增长」(inclusive green growth)和促进「绿色工作」(green jobs)的绿色交易(Green Deal),此推动聚焦於一种能够在避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如消费主义)或资本主义结构(如不均称的雇佣关系)的情况下达到环境永续能力的技术革新;亦有再者渴望更深刻的「社会一生态转型」,在其中,经济服从於社会和生态需求的满足,而非利润。

据上述[,]我将对由 Amartya Sen 和 Martha Nussbaum 所发展的能力取向 (capability approach)进行一番激进的诠释,探索这一理论如何帮助我们去想像一个更具解放性和永续性的未来。显然,描绘一种有价值的未来并非社会学(或哲学)所独有的任务:未来需要以民主的方式,在公民的参与中被共构。我主张:能力取向允许我们对「我们要的未来」采取一种民主式的观点。

> 关於对能力的激进诠释

能力取向的主要论点是,公共行动应该将 焦点放在促进人的能力,比如使他们过上那透 过理性赋予价值的生活的真正自由。在这个观 点下,社会的进步并不等同於经济的增长,而是 等同於消除各种通往人类繁荣(译按:这里指的 是人类的繁荣,而非人类社会的繁荣)之路上 的障碍:公共政策应该扩展个人自由以便实现 有价值的「存在」(beings)和「作为」(doings), 如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性化观念。这一关注迫使我们从最终目的的角度进行反思,并申论什麽是从根底上重要的。除此之外,能力取向还为民主赋予一项关键任务:民主参与不仅具有工具性的功能(允许公民发表意见以便促使公共行动能更好地反映他们的利益),而且同时具有建设性的作用,即能够塑造社会优先事项(societal priorities)以及——有鉴於美好生活的观念会在审议的过程中改变——甚至是个人的价值。

在此基础上,我以为,相较於去支配政策圈, 能力取向应能以更激进的方式加以框构。的确, 能力取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连结能够加以更深 刻的质疑。能力取向的主要诠释强调增长自身并 非目的,而是实现有价值之目的的手段。然而,有 鉴於其对环境造成的灾难性後果以及对人类福 祉的不良影响,经济增长甚至不是一种合适的手 段而应被公共行动完全弃绝。在许多情况下,经 济增长是在人类的苦难及环境的灾难中得到实 现的:从地震成为建筑业经济增长的引擎到生 产造成的污染所导致的各种疾病。即使表面上看 (prima facie)属於积极正面的,实际上却令人 失望。比如,丰裕(opulence)会鼓励人们采取终 将损害人类福祉的,对美好生活的贪婪-物质主 义和竞争一个人主义式愿景。据此,西方的生活 方式不仅是无法维持的:从福祉的角度来看,以 增长为基础的「发展」模型的可取性本身就已经 足够可疑。

同样地,能力取向的核心观念——即个体应该被当作能动者(agents)来对待——在政策世界中已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然而,人们在此却是以一种狭隘的能动者涵义被加以构想的,亦即仅仅被当作一种参与到市场中的经济行动者,而相对地能够共同决定社会变革方向的民主公民在此却被边缘化了。在这种背景下,能力取向被涵括进新自由一个人主义对「培力」(empowerment)的诠释中,这种诠释将人的自由降低为参与经济(特别是劳动市场)与否的自由。能力已然成为人力资本的同义词:个体成为成功的经济行动者所需要的一套技能。

透过同时拒绝经济增长和将人们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公共行动的理想目标,一个对能力取向更为激进的诠释将意味着:赋予公民去共同决定社会变革的方向并从最终目的出发去讨论

发展、进步以及生命质量的意义的能力。这种理解需要减少市场在塑造集体使命所能造成的影响,以及(部分地)取代它们以参与一审议式民主政治。

> 将公共行动聚焦於「关照世界的能力」

在这一点上,能力取向能够结合以女性主义理论家所发展的「关怀伦理学」(ethics of care)。正如 Joan Tronto 所建议的,关怀视角突显了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所关心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关心利益的制度,其中对个人的奖励取决於其对这一利益所带来的贡献。然而,我们可以建造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关心他人(包括儿童、老人和病人)、关心环境(以环境保护/维护及环境修复的形式)、关心民主制度并且关心社会自己(运动、艺术、教育等)过於任何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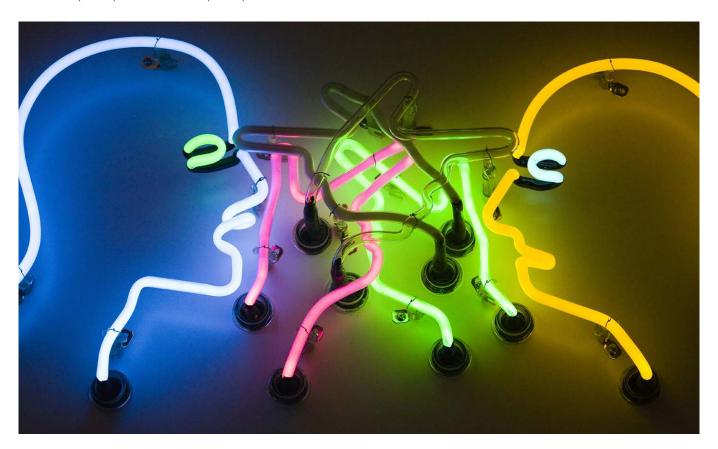
从这个角度来看,奖励可以从生产转移到社 会再生产,工作也能够重新概念化为一种关照 世界的活动。後者的涵义应该绣过民主审议来界 定。进而,民主能够在确立何谓社会贡献的问题 上(部分地)取代市场。这种建基於社会有用性而 非市场价值的对工作的理解,在这疫情时刻随着 对「基本」工人的诸讨论而被突显了。遵循这一 框架的议程将能对抗资本主义社会中「垃圾工 作」(David Graeber)——绿色或其它——的扩 散,并促进个人从事有意义工作的能力。後者涉 及一种在劳动市场内或外完成的活动,这种活 动能够为从事该活动的个体提供人类繁荣的机 会,并以一种「客观地」有价值的方式为社会做出 贡献,并且在这点上,所有公民都平等地参与到 关於「什麽是有价值」的民主式的讨论中(Ruth Yeoman) o

总而言之,一旦能力取向对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批判性愿景越发明确,那麽其将能更多地启发改革论者,并建议将公共行动聚焦於促进「关照世界的能力」而非经济增长或将人们纳入劳动市场,而前者已然包含了参与到关於「什麽是值得关心的」讨论中的权利。■

來信寄至: Francesco Laruffa <<u>Francesco.Laruffa@unige.ch</u>>

>人类作为文化人

Mahmoud Dhaouadi, University of Tunis, 突尼西亚, ISA 社会学史研究委员会 (RC08)、宗教社会学 (RC22) 和语言与社会 (RC25) 研究委员会成员



人类不仅是说话的动物,而且是不同文化符号的使用者。语言需要被理解为这些文化符号的基础。

來源:Flickr/ Thomas Hawk

会科学中缺少文化人的概念。经济 学家和物质论观点的学者将人描述 ▲为经济人,政治学家将人称为政治 人,社会学家将人视为社会人。由於现今数字 越来越频繁的被使用,有些人则将人描述为数 字人。然而,尽管当代人类学家钻研在文化研 究,但他们并没有使用与文化相关的术语来描 述人类首先是一个文化人。实证主义认识论在 社会科学中占主流地位。它主张感官体验是知 识的基石。许多重要的人类学家都可以见到这 种认识论的影响。Leslie White 1973 年出版 的《文化概念》中提到 Ralph Linton、Radcliffe-Brown 和其他学者认为,文化是一种抽 象的,或者不存在的东西,也没有指明具体的 现实。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几乎不会对文化这 种非感官和模棱两可的现象表现出兴趣。

> 实证主义持续的负面影响

上述那种对文化分析的避免也出现在开创西方社会学的学者中。众所周知,1960年前的文化理论家,如韦伯、涂尔干、马克思、帕森斯、米尔斯和其他学者出版的作品中对文化抱持弱纲领的分析。也就是说,他们较不重视对文化的分析,文化在他们的分析中比较没有自主性。此外,伯明翰学派、布迪厄和傅柯也抱持弱纲领的分析观点。尽管自1990年代後期「文化转向」诞生以来,文化社会学越来越关注文化,也就是所谓的强纲领,但对弱纲领的趋势仍然主导着今天的文化社会学研究。

> 寻找文化人

我的研究意外地使我对文化研究产生了长期

的兴趣。我在1990年代的研究兴趣激发我去尝 试发展一个理论框架,来理解、解释人们的行为 以及人类社会的动态。在 Richard Swedberg 2014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艺术》一书中,他认 为社会学理论有不足之处。我觉得我应该尝试探 索新的理论观点,因此我先提出方法论上的问 题:探索人类行为和社会动态背後的力量的起点 应该是什麽?我想应该先从区分人类物种与其 他物种的特殊特徵开始。在尝试区别这些特徵 时,我应该从头开始研究。在追求潜在的独特人 类特徵的过程中,终於发现了我在寻找的东西: 文化符号(CS),即语言、思想、知识、宗教、 法律、神话、文化价值观和规范。因此,对CS的 研究似乎是理解和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的 基础。我的理论使我将语言视为CS诞生背後的 推动力:语言是CS之母。也就是说,人类不仅是 古代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所说的会说话的动物, 而且她/他还是CS 的伟大操作者。因此,我的我 思故我在版本是:我使用语言,因此我是人类。

这些理论假设和实地观察有力地加强了文 化人的概念。我发现了四种不同的人类特徵,这 可以解释为什麽人类是文化人。

> 对人类差异的基本观察

如前所述, CS作为人身分的核心在当代社会科学可能是新的概念。我对以人类身份(Homo Culturus)为核心的CS以以下概念陈述:

- 1)与大多数其他生物相比,人体的生长和成熟过程是缓慢的。例如,平均而言,人类婴儿在一岁时开始走路,而动物宝宝可能会立即或在出生後几小时或几天内开始走路。
- 2)人类比大多数动物的寿命更长。
- 3) 人类在地球上具有主导地位。
- 4) 人类因CS而享有优势。
- 5)人的身份由两部分组成:身体和CS。它是一种 双重身份,在宗教和哲学中通常被称为由身体和 灵魂组成的双重身份。

> CS带给我们的洞见

人类在身体和CS的成长和成熟都很缓慢。 人整体发展是二重的。相比之下,非人类物种的 成长和成熟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向的(仅身体),因 为它们缺乏广泛而复杂的人类意义上的 CS。人 类缓慢的身体生长和成熟都需要在两个层面上 取得进步。人体生长成熟的过程变慢了,可以说 是因为人类参与了以CS为代表的第二次生长成 熟过程。

CS 应该有助於回答《科学美国人》特刊(2018年9月)封面上的难题:「人类:为什麽我们不同於地球上的任何其他物种。」 如上所述,人类凭藉 CS 而与其他物种不同。下图说明了为什麽人类是文化人。



> 文化人与简约原则

上图所呈现的是 CS 可以解释四种不同的人类特徵。CS可以解释人类个体和群体的无数具体行为,以及社会和文明的各种动态。因此,CS与简约原则相符合:使用少的变量来解释更多的现象。■

來信寄至: Mahmoud Dhaouadi <m.thawad43@gmail.com>

> 2011年7月22日的挪威恐怖袭击

Pål Halvorsen, Scandinavian University報刊编辑,挪威



乌托亚岛的主楼,在其上有69人被杀。 來源:Pål Halvorsen。

「**事情结束了,其再现仍未**。」 Alexander, J. C. & Gao, R. (2012)

jotolf Hansen,比较为人所知的名字是Anders Behring Breivik。他於 2011 年 7 月 22 日在挪威发动了两次恐怖袭击,第一次是在挪威的政府行政区,第二次是在工人青年团(Worker's Youth League)举办夏令营的乌托亚岛(Utøya)。十年後的今天,挪威社会仍在努力解决随後引发的问题。这场袭击造成了77人死亡,多人受伤。他们不只是袭击了挪威,也同时袭击了整个世界,因为这场夏

令营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参加。此外,国际媒体也报导了整起袭击事件,关於袭击事件会不会引发国际上的模仿效应,这类问题也马上被抛了出来,但其实挪威社会有足够的能力应对随之而来的现实选择。许多人在事件发生後的访谈中都强调了袭击发生的时间,那是奥斯陆(Oslo)的大多数人都在度假,城里没什麽人的夏季中旬。这样的时机点使社会在面对这样可怕的事件时可说是毫无准备,人们的临场反应也没有预期的那麽快。在事件中,有一名以全名投降的恐怖分子,他在袭击发生前曾广泛地宣传一份「宣言」。人们正以这份现有的素材为

出发点寻找「答案」。两个不同的法庭心理学委员就以相同的研究方式去探究布雷维克是否心理正常,但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第一个委员会发现他患有妄想型思觉失调症,而第二个委员会发现他有自恋型人格疾患,但认为他在袭击的期间始终保持清醒。奥斯陆地方法院认定Breivik在神智清醒的状态下犯罪,对他采取挪威的最高刑罚:21 年的监禁,而且可能会延长监禁期限。此外,在入狱的期间 Breivik 也改变了自己的名字。时间来到2019 年 3 月 15日,Brenton Tarrant 在纽西兰的基督城对穆斯林发动了恐怖攻击。他清楚地提到Breivik是他发动恐怖攻击的灵感来源,因此挪威的「7 月 22 日」又再次成为了国际新闻。

「7月22日」一词在这起事件过後,已变成一种文化创伤的转喻(metonym),其不仅反映了历史事件本身,也反映了後续的过程,例如「9/11」事件也是如此。而这些事件提出了关於集体认同的迫切问题,并挑战了先前关於「挪威性」(Norwegianness)的概念。正如挪威产业总工会所提出的疑问:「我们『其中的一份子』怎麽会变成大屠杀的凶手?」这种为讨论打下集体基础的方式是文化创伤的指标之一。

有许多关於「7 月 22 日」的文学在国际 上(不只是挪威)广泛地大量出现。在这之中 最着名的或许是 Åsne Seierstad 所着的纪 实作品"One of us",这本书的名字如实地 反映着现实。此外,在学术文献中,人类学家 Sindre Bangstad 在 2014 年写下了" Anders Breivik and the Rise of Islamophobia ", 其中细腻地探讨了恐怖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动 机为何。Bangstad 则是将伊斯兰恐惧症的危 险性作为主要的背景脉络来研究。Sveinung Sandberg 研究了 Breivik 宣传的「宣言」中 所呈现的自我叙述,并发现了四种人们进行分 析的方向:「战略性的、具有决心的、统一的 、支离破碎的。 |他还指出分析 Breivik 的不 同面向如何反映出,反伊斯兰主义者所强调的 Breivik 的能动性与左翼势力所强调的结构性 方法之间的斗争。此外,其他涉及的研究领域 还包括媒体研究、多元文化主义的辩论、信任 与公民参与、反恐政策。以上这些研究领域都 尝试着去探讨 7 月 22 日所造成的影响。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恐怖袭击後政府曾投入资金协助奥斯陆大学建立极端主义研究中心。根据 Cynthia Miller-Idriss 所说的:「现在这里被公认是拥有最全面的全球极右翼极端主义学术 及公共政策专业知识中心。」

虽然这里不是提供关於 7 月 22 日学术研究资料的地方,但以下将举出我和 Tore Rafoss 在挪威社会学杂志中不停研究而成的「7 月 22 日」专题文章,以此作为呈现此事件全貌的几个例子,而这些文章也涵盖了不同的层面。第一篇文章:〈在恐怖主义後,挪威、法国和西班牙中的信任〉,研究了在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後,叙事作为公民对政治家及社会所信任的一部分元素,其重要性为何。文章以在2016年的尼斯和2017年的巴塞隆拿中所发生的恐怖袭击为案例进行比较。

第二篇是关於记忆工作的文章:〈对恐怖主义作出回应的国家纪念馆〉。文中透过比较俄克拉荷马城国家纪念馆和纽约的911国家纪念馆的方式,分析了在奥斯陆及乌托亚岛建立国家纪念馆的过程。文章在结尾讨论了,国家纪念馆如何自相矛盾地掩盖历史事件和记忆行为的政治层面议题。

第三篇文章:〈7 月 22 日事件後法院的角色〉,透过记录法院与事件生还者之间的关系、记忆工作和重建,去勾勒出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议程。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了解法院如何应对特殊的极端事件。

接着将被评论的书是 Cynthia Miller-Idriss 的《家乡的仇恨》、Gjelsvik 的编辑选集《工作方法》、Eirik Høyer Leivestad 的《民主中的恐惧和厌恶》和Hallvard Notakeriet的《工党和7月22日》。

正如从这些文章和书评可以看见的那样, 社会学的力量就在於研究「7月22日」的广度。

> 來信寄至: Pål Halvorsen <pal.halvorsen@universitetsforlaget.no>